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2015年6月号

可持续发展目标
如何终结现代奴隶制
水价

金融与发展

你能靠每天 **1.25美元** 的生活费活下去吗？



近 **10亿** 人每天的生活费比这还要少

全球共同努力 终结极端贫困



《金融与发展》是IMF的季刊，
用英文、阿拉伯文、中文、法文、
俄文和西班牙文出版。

英文版刊号 ISSN 0015-1947

Jeremy Hayden

主编

Marina Primorac

责任编辑

Gita Bhatt

James L. Rowe, Jr

Jacqueline Deslauriers

Rani Vedurumudi

Hyun-Sung Khang

Simmon Willson

Natalie Ramirez-Djumena

高级编辑

Maureen Burke

Bruce Edwards

助理编辑

Lijun Li

印刷/网络产品专员

Sara Haddad

社交媒体经理

Niccole Braynen-Kimani

高级编辑助理

Meredith Denbow

编辑助理

Luisa Menjivar

创意主管

Michelle Martin

美术设计

编辑顾问

Bernardin Akitoby

Laura Kodres

Bas Bakker

Gian Maria Miles-Ferretti

Helge Berger

Inci Otker-Robe

Paul Cashin

Laura Papi

Adrienne Cheasty

Uma Pamakrishnan

Luis Cubbedu

Abdelhak Senhadji

Alfredo Cuevas

Janet Stotsky

Domenico Fanizza

Alison Stuart

James Gordon

Natalia Tamirisa

Thomas Helbling

欲知广告事宜，请与IMF出版部联系。

地址：700 Nineteen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电话：(202)623-7430

传真：(202)623-7201

电子邮件：publications@imf.org

©版权所有，IMF 2015年。翻印本刊文章

应向主编提出申请。地址：

Finance &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电话：(202)623-8300

传真：(202)623-6149

网址：http://www.imf.org/fandd

本刊对非经济目的的翻印一般会迅速

免费予准。

本刊的文章及其他材料仅为作者本人观点，

并不反映IMF的政策。

中文版由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翻译出版。

地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

电话：88190916

传真：88190916

邮政编码：100142

网址：http://www.cfeph.cn

中文版刊号：ISSN 0256-2561



金融与发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季刊

2015年6月号·第52卷·第2期

特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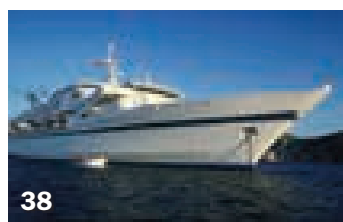
发展日程

- 8 **高瞻远瞩**
新发展目标能够促使全球各国不断取得进步，提高生活质量
查尔斯·肯尼
- 14 **追求质量**
单靠高增长无法改善社会状况
蒙特福特·穆拉驰拉、雷纳·塔普索巴、桑帕闻德·塔普索巴
- 18 **杯子是半空还是半满？**
制定适当的激励机制有助于应对水资源挑战，同时保护贫困人口
卡尔帕纳·科克哈尔、凯瑟琳·帕蒂略、孙艳
- 22 **直言不讳：发展之路**
国际合作、承诺和灵活性对改善全球状况至关重要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 24 **图表释义：全球目标**
各国政府提出17项目标以应对全球挑战
娜塔莉·拉米雷斯-丢梅那



本期还有

- 26 **恐怖主义的危害**
恐怖分子不仅会直接造成人员伤亡，更会引发无数经济问题
苏布哈予·班德亚帕德耶、托德·桑德勒、杰夫·雅那斯
- 29 **未被打破的枷锁**
尽管奴隶制在几乎所有地方都被法律所禁止，但其依旧在全球经济的阴暗处存在着
马尔贾·罗塔南、吉安路卡·斯波西多、佩蒂亚·奈斯特罗瓦
- 34 **走向非洲大陆**
多家非洲银行集团正在该区域扩展业务，给传统银行和监管机构带来了挑战
亚历山德拉·博恩、保罗·马修
- 38 **富人与大衰退**
侧重于使用中产阶级行为来解释美国的繁荣与萧条可能太过于狭隘
巴斯·巴克、约书亚·费尔曼
- 41 **受阻的改革**
改革场外衍生品市场的举措正在进行，但是远远落后于预定计划
约翰·基弗



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全球发展的进程中，今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全球领导人将在7月、9月和12月召开的三次重要会议上汇聚一堂，推动全球减贫进程与合作，以提高生活质量。

今年7月，政府官员和民间组织代表、捐赠团体以及私人部门将参加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会议，为帮助数百万人口摆脱极端贫困提供所需资金保障。

9月，国际社会将再度聚首纽约，回顾今年到期的千年发展目标(MDG)所取得的进展，并启用新的发展目标，即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新的目标描绘出了今年至2030年期间的发展蓝图。

最后，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将于今年12月份在巴黎召开，届时与会者将制定一系列环境目标，以确保未来可持续发展。

诸如此类的努力通常会产生争议，有时也会引发怀疑。可持续发展目标提案较为复杂，共包含17个目标和169个子目标，这引起了一些批评人士对其价值的质疑。

但是，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此问题上提示我们说，自从2000年实施了千年发展目标以来，世界各国已经取得了坚实的进展。她说，本年度内的一系列国际会议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世界各国可以统一思想、推进伙伴关系并寻求解决方案。

本期《金融与发展》总结了当今世界的发展议程，并剖析了我们把握这一机会的最佳途径。

自从2000年以来，全球发展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查尔斯·肯尼一直在关注发展议程所取得的进展。他认为，全球需要在亚的斯亚贝巴融资会议和巴黎气候会议上达成强有力的协议，以持续取得进展。

增长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增长之间是存在差异的一增长的质量至关重要。蒙特福特·穆拉驰拉、勒内·泰普索巴和萨姆帕文德·泰普索巴采用了一个专门指数来衡量增长质量，并藉此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指引。一篇有关确保全球人口，尤其是最贫困人口获得清洁水的文章以及“图表释义”栏目关于从千年发展目标向可持续发展目标过渡的信息图表大体说明了整体情况。

在本期，我们深入探讨了全球经济中的阴暗隐秘之处，探究了恐怖主义带来的经济损失以及人口贩运的成本问题。

此外，我们还探讨了非洲区域性银行的扩张、“阿拉伯之春”的经济后果、欧元区如何得益于德国的基础设施支出、改进衍生产品场外交易市场的努力以及青年失业问题。

最后，IMF出版人、《金融与发展》前主编杰里米·克里夫特介绍了以质疑重大宏观经济问题传统理念而著称的伦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埃莱娜·雷伊。

杰弗里·海登

(Jeffrey Hayden)

主编

- 46 资本理念
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开支，德国不仅帮助了自己，也帮助了整个欧元区
塞利姆·埃莱克达、德克·缪尔
- 50 帮助求职者
年轻人失业会给家庭、社会和国家带来伤害
康铨承
- 55 “阿拉伯之春”后的这四年
尽管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仍须对其经济中的一些根本缺陷进行纠正
阿德南·马扎雷、托克希尔·米兹奥维

其他内容

- 2 简讯
- 4 经济学人物
质疑者
杰里米·克里夫特
采访伦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埃莱娜·雷伊
- 32 货币
纸币创建者
南非最新的货币设计向国家多元化致敬
西蒙·威尔逊
- 44 回归基础
什么是资本主义？
自由市场可能并不完美，但却可能是组织经济的最佳途径
萨尔瓦特·贾汗、艾哈迈德·萨比尔·马哈茂德



插图：封面，IMF photos；第2页，Philippe Lissac/Godong/Corbis，ThinkStock，Benedicte Desrus/Sipa USA/Newscom；第3页，Doc-Stock/Corbis，Christophe Launey/Race for Water；第4页，Steve Forrest/Panos；第7页，Manar Hussain；第8、11、13页，Bart Verweij/World Bank；第10页，Arne Hoel/World Bank；第12页，Nahuel Berger/World Bank；第14页，Kate Mitchell/Corbis；第18页，Jim Lo Scalzo/epa/Corbis；第22页，Stephen Jaffe/IMF；第24—25页，背景照片，ThinkStock，其他照片，Corbis；第26、28页，Porter Gifford/Corbis；第29页，Rafael Ben-Ari/Chameleons Eye/Newscom；第32—33页，South African Reserve Bank；第34页，Nadine Hutto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第38页，Charles Smith/Corbis；第41页，AP Photo/M. Spencer Green；第46页，Arne Dedert/picture-alliance/dpa/AP Images；第50—54页，Vanessa Tuduri，Henry Rivera Angulo 和 Elizabet de Miguel Rodriguez 的照片，Gianluca Battista，Ann-Marie Taylor 的照片，Sam Friedrich；第55页，Philippe Lissac/Godong/Corbis。

本刊在线阅读网址：www.imf.org/fandd

浏览《金融与发展》的Facebook：
www.facebook.com/FinanceandDevelopment

向外扩张并靠岸

世界银行 2014 年的一份报告《全球金融包容性指数》(Global Findex) 称, 过去五年间有 7 亿人在银行、其他金融机构或移动支付业务提供商开设账户, 没有这类账户的成年人数量下降了 20%, 达到 20 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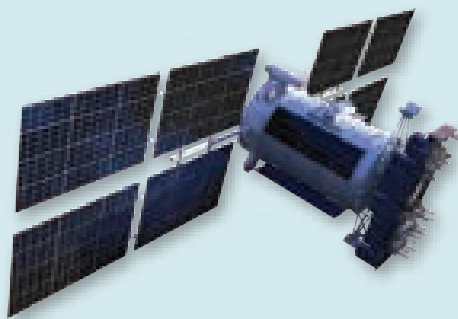


手机转账, 肯尼亚内罗毕。

2011—2014 年, 拥有账户的成年人比例从 51% 增长至 62%。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动支付账户数量的增加有助于这一快速增长并扩大了获取金融服务的范围。

该报告发现, 仍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以扩大发展中经济体的妇女和最贫困家庭的金融包容性。账户拥有者的性别差距并未缩小: 到 2014 年, 仅有 58% 的女性有账户, 而男性的这一比例为 65%。从地区层面而言, 南部非洲的性别差距最大, 达到了 18 个百分点。

技术有助于促进账户的使用, 并转变了国内支付的方式。发展中经济体有 3.55 亿拥有账户的成年人用现金或在柜台汇出或收到过国内汇款, 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的 3500 万成年人。此外, 发展中经济体中 13 亿拥有账户的成年人使用现金支付垃圾处理费、水费和电费, 超过 5 亿使用现金支付学费。通过手机或者零售终端, 数字支付的获取提供了更加便利和负担得起的支付选择。



勇往直前

亚洲开发银行和日本正帮助亚太地区的国家接入最新的技术, 包括卫星地图, 以预防——以及更快速有效地应对——自然灾害。

亚洲开发银行将日本提供的 200 万美元技术援助赠款用于培训亚美尼亚、孟加拉国、斐济和菲律宾的政府和社区官员以及地方志愿者使用最先进的天基技术和其他用于防范灾害的高科技工具。这四个国家将成为该地区接受这些技术的潜在的先驱。

近年来, 使用天基技术(包括诸如全球定位系统(GPS)的星基系统)以防范和应对灾害, 正快速增长。但是很多发展中经济体缺乏接受新技术的资金和经验, 而这些新技术能够补充其已存在的早期预警和灾害监控系统。

技术援助项目将培训目标国的政府机构和地方社区使用 OpenStreetMap (这是一个免费的、全球数字地图平台) 以及移动电话应用程序, 以使每个国家可以为防范风险计划收集基于社区的信息。

退休金计划

根据最近一项由泛美开发银行、经合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发布的研究, 由于缺少养老保险改革, 拉丁美洲正在壮大的中产阶级可能在年老之时陷入贫困的境地。这项研究考虑了该地区 26 个国家的养老金模式。

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政府的更高的养老金支出; 同时, 大量工作者在非正规部门就业——他们并未作出缴纳养老金——将使养老金福利的充足性面临风险。目前, 100 名工作者中仅有 45 名缴纳了养老金, 该比率近年来有所变化。到 2050 年, 该地区将有 6300 万—8300 万人口面临养老金不足的风险, 除非进行养老保险改革以及努力增加正规部门的就业、获取优质教育。

缩小养老金覆盖范围差距的使用最广泛的方法是扩大不用职工缴款的养老金计划。这些政府补贴有助于减少不平等和减贫, 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受益人的增加, 这将使财政面临挑战。如今, 该地区适龄工作者和退休人员的比例为 8:1, 但到 2050 年该比例将降至 2.5, 接近经合组织的平均值 1.9。

该地区很多国家仍然缺乏养老金稳健管理的体系和制度能力, 包括缴款和不用职工缴款的养老金计划。这意味着该体系更多的投资和制度框架改革是实现更广泛的养老金覆盖面和可持续性重要的步骤。



巴西圣阿马鲁, 玩多米诺骨牌的人。

针尖

世界卫生组织 2014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多人共用同一注射器或针头进行注射导致一些致命的传染性疾病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

该研究指出，在 2010 年有约 170 万人因不安全的注射而感染乙肝病毒，约 31.5 万人感染丙肝病毒，3.38 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世界卫生组织呼吁使用新型“智能”注射器，这类注射器无法重复使用。一种注射器的活塞里有一个脆弱的东西，一旦使用者试图再次把活塞拉出，这个东西便会坏掉。另一种注射器有一个金属夹，能够防止活塞被再次拉出；还有一种注射器的针头会在注射完成后回缩至针筒里。在注射完成之后，保护罩会自动罩在针头上的注射器也能够保护医务工作者，以防被针头刺伤而受到感染。

世界卫生组织敦促各国在 2020 年前全面改用智能注射器，个别例外情况除外，例如静脉抽取过程必须要重复使用普通注射器。联合国机构为在发展中经济体使用而购



智能注射器能够阻止重复使用，避免感染。

买的无安全保护的注射器只需花费 3—4 美分。而智能注射器的价格是它的两倍，但世界卫生组织预计随着需求量的增加，价格会下降，同时呼吁捐赠者能够对使用这种智能注射器提供支持。



与塑料制品赛跑

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支助的瑞士探险队水中漫游 (Race for Water Odyssey) 将在 2015 年航行超过 40000 海里，对海洋塑料污染情况进行首次全球评估。在不足 300 天的时间里，这支探险队将在 13 个国家进行 11 次科考停留和 9 次外延停留，考察位于 5 个“垃圾漩涡”的海岛沙滩。由于风和洋流的作用，海洋上漂浮着塑料垃圾，而这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这支探险队在 3 月 15 日从法国波尔多出发。跨越大西洋后，探险队将通过巴拿马运河进入太平洋，行至南美洲，接着将针对南太平洋的海岛沙滩的垃圾进行考察分析。

“每年都会数量庞大的垃圾注入海洋，持久不

断，并造成了全球和代际间的海洋污染，”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希姆·斯坦纳 (Achim Steiner) 说。“各国政府、私营部门、民间团体和学术界的合作是避免垃圾进入这个脆弱的环境的关键。”

水中漫游寻求保护海洋和淡水的具具体且可持续性的行动，以及与诸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等组织的合作。

2015年大记事

6月1—13日，瑞士日内瓦

国际劳工大会

6月4—5日，德国埃尔毛宫

八国集团峰会

6月6—13日，意大利罗马

粮农组织大会

7月13—15日，埃塞俄比亚的斯亚巴

联合国发展融资大会

9月25—27日，美国纽约

联合国接受2015年后发展议程峰会

10月9—11日，秘鲁利马

IMF和世界银行年会

11月30日—12月11日，法国巴黎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大会

质疑者



埃莱娜·雷伊在伦敦商学院的校园里。

杰里米·克里夫特
采访伦敦商学院
经济学教授
埃莱娜·雷伊

天气好的时候，埃莱娜·雷伊（Hélène Rey）喜欢骑着她的滑板车，穿过伦敦摄政公园，来到自己上班的地方——伦敦商学院院内被白色柱廊所环抱的办公室。她会沿着她那个面积不大、摆满书籍的办公室外面狭窄的走廊，展示她不俗的技巧。在她快速向前滑行时，利用左脚娴熟地控制着滑板车铝制框架的后刹。

“我住的地方就在公园对面，所以上班非常方便，”这位曾荣获多项大奖的著名经济学教授说。“公园有许多野生的白鹭、翠绿色的长尾小鸊鹬以及大量的野鸭。偶尔还可以看到黑天鹅——不过它们并不完全罕见，”埃莱娜轻声笑着说。事实上，摄政公园里的一对黑天鹅（传统上终身为伴）不久之前成为全球媒体的头条新闻，由于这两只黑天鹅在求偶期间过于吵闹，而被公园管理者强行分开。

畅销书作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采用“黑天鹅”事件这一术语来描述一些罕见发生的事情，正如黑天鹅在自然界非常罕见一样，这些事情完全不可预测或不可能想象得到，但在商业和金融领域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针对塔勒布的提法，雷伊说，“不过在现实生活中，黑天鹅并不完全罕见。我并不认为重大影响是一件非常异乎寻常的

事情。它取决于系统以及你给予人们的刺激因素。”

关注重大问题

目前，雷伊及其丈夫和八岁大的女儿居住在两套紧挨在一起的现代化联排别墅中。她以敢于质疑现已被人们公认的普遍看法，特别是对国际金融体制、美元作用以及其他主要宏观经济问题的看法而享有盛誉。经济学家同行们称赞她的研究工作和看法“引人深思”和“有影响力”。

雷伊说，“我时常关注的是经济学领域中的重大问题。”雷伊的丈夫是同为伦敦商学院教授的经济学家理查德·波茨（Richard Portes）。波茨1983年创办了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一个由欧洲经济学家组成的研究网络。在伦敦接受《金融与发展》杂志的采访时，雷伊说：“你必须研究国际宏观经济状况，才能认清这些重大经济问题。”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皮埃尔·奥利弗·古林查斯（Pierre-Olivier Gourinchas）认为：“她总是关注影响国际货币体系或整个金融领域的部分深层次因素。”与雷伊一样，古林查斯也是法国籍经济学家。

都柏林圣三一学院教授菲利普·莱恩(Philip Lane)认为,“她(雷伊)的研究工作以富有耐心和专注度而闻名。她建立了多个大规模的长期项目,最终推动了知识的重大进步,而不是满足于一些‘快速见成效’的研究项目。”

1998年,雷伊同时从伦敦商学院和巴黎社会科学高等学院毕业,获得两个不同的博士学位。此后,她因其引人深思的研究成果荣获欧洲多项经济学大奖,并呼吁更多的妇女跻身经济学研究行业的高级职位。

“埃莱娜总是关注重大问题,并通过极其周密的分析数据来回答这些问题,”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说道。“如果你希望在(经济学研究)这一行业取得成功,那是一个最佳的组合,而她(埃莱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去年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研究会议上,布兰查德如此介绍雷伊。

荣获多项大奖

2006年,雷伊因其在对外贸易和金融不平衡的因果关系、货币国际化以及金融危机的深入认识方面的卓越研究成果,荣获2006年“伯纳瑟奖”(Bernácer Prize,专门授予欧洲40岁以下的最优秀宏观经济和金融经济学家)。

2012年,雷伊荣获欧洲经济协会颁发的首届比尔吉特·格罗德奖(Birgit Grodal Award),该奖项是专门用于表彰在经济学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欧洲女性经济学家。2013年,她与同是法国籍的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共同荣获两年一度的叶留·杨森奖(Yrjö Jahnsson Prize),也成为首个荣获该奖项的女性。皮凯蒂出版了一本有关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13年雷伊荣获叶留·杨森奖,因其在国际金融研究领域,特别是对汇率和国际资本流的界定方面所做出的原创性贡献。评审委员会指出,她“长期致力于研究一直困扰众多经济学家和决策者的许多重大国际金融问题,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都柏林圣三一学院教授莱恩指出:“她将理论与经验相结合,使得她的研究工作对政策分析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着重关注经济学研究的同时,雷伊说,她在工作之余对她喜欢做的事情表现也“非常正常”。“我喜欢看书;喜欢听音乐——伦敦的一大特点是音乐会很多。”在她有空的时候,还喜欢和女儿一起踢球或者自己去游泳。“因为我小时候在乡村长大,所以我还喜欢到森林里去旅行或爬山。”

改变人们的看法

雷伊的父母分别是土木工程师和教师,她在位于法国中部地区一个美丽的市镇布里乌德(Brioude)长大。雷伊将她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功归功于她在法国教育体制下打下的很好的数学基础。在巴黎一所大学读完本科后,她获得了攻读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硕士学位的奖学金。“于是我很早就接触到了美国教育体制,”她说。然后,雷伊

重新回到欧洲攻读博士学位。她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等诸多著名大学任教,包括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短暂执教。

她最具影响力的研究工作之一,是她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期间,与古林查斯共同开展的有关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作用的研究。布兰查德认为,该研究工作“改变了人们对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看法。”

在最近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众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主要关注的是美国不断扩大的经常项目赤字,而古林查斯和雷伊的研究表明,鉴于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美国在经常项目方面的赤字状况并没有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糟糕。

“尽管美国的贸易赤字巨大,但经济学家们并没有考虑到美国从资本收益和美元汇率变动中获得大量金融收入,”古林查斯对《金融与发展》杂志如是说。

“例如,几乎所有的美国外债都是以美元计价的,而大约70%的美国境外资产是以其他货币计价的。因此,美元汇率贬值10%,就将使其境外资产增值,使大约5.9%的美国GDP从世界其他地区转入美国。相比而言,2004年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赤字仅占美国GDP的5.3%。因此,这些资本收益可以说非常巨大。”

正如古林查斯和雷伊(Gourinchas和Rey,2005年)指出,美元贬值对美国的外部地位具有两方面的好处,即增加美国净出口额以及提高美国资产的美元价值。

古林查斯和雷伊表示,美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心的地位为美国赋予了他们称之为“过度特权”的东西(20世纪60年代由时任法国财长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创造的一个词,用以描述美国从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中获得的优势)。古林查斯和雷伊解释道,“过度特权”的形成是因为美国可以在世界金融市场中按低于市场价格的利率借贷,从而在其境外资产中获得高收益。他们跟踪了美国是如何逐渐承担风险更高的海外投资。

美国:世界银行家和世界承保商

“然后,我们进一步发展了这些看法,指出了美国所发挥的重要角色,使之看上去更像世界其他地区的承保国,”雷伊解释道。

二战以后,美国接替英国成为世界银行界的主宰者、国际主要货币(美元)的发行者以及国际流动性的提供者。

这尤其意味着,美国可以短期借贷(外国人愿意购买美元流动资产)和长期放贷(美国向境外企业提供长期贷款和投资资金)。如同银行一样,美国可以从其外部资产带来的高收益与债务成本的差价中提取中介费用。

古林查斯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已成为类似于全世界的风险投资者。“自始至终,美国资产已越来越多地从长期银行贷款转向外国直接投资(FDI),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转向外国直接投资和股市。与此同时,美国的债务仍主要是银行贷款、贸易信贷和负债,即收益率低的安全资产。”

“因此，美国的资产负债状况日益类似于风险投资者，在资产层面具有高回报的风险投资。此外，其杠杆率也出现了长期大幅增长。”

雷伊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他们扩大了对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发现美国的角色发生了逆转，它通过其对外投资组合将资金大规模地投向世界其他地区。“我们估算，仅2008年（这一投资比例）就占美国GDP的13%—14%。因此，这一比重非常大。”

同时，美国“对世界经济和世界其他地区提供相当于全球承保商的服务——在经济发展状况良好的时期获得相当于保险费的收益，而在经济发展状况不佳的时期进行赔付。这正是我们在数据中所发现的情况。”

雷伊说，“一方面，美国享受‘过度特权’；另一方面，作为全球承保商，美国也有在危机时期承担‘过度责任’的义务。”

在杰克逊·霍尔会议上的讲话

雷伊研究中的另一个方面是对经济学的另一个陈旧观念提出了质疑。这种过时的观点认为，各国只能实现“三元悖论”（impossible trinity），即固定汇率、开放资本市场（无资本控制）和独立货币政策中的其中两个方面（见专栏）。

“三元悖论”认为，在资本自由流动的世界，一国只有通过让其汇率自由浮动，才能实现独立的货币政策（Obstfeld和Taylor，2004年）。

2013年，在美国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召开的会议上面对各国央行行长发表的一次有影响力的讲话中，雷伊指出，目前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都日益开放金融市场，而事实上，金融全球化的大规模发展在此之前已对这一理论（三元悖论）提出了质疑。

由于许多关键决策是由金融体系的中心（美国）做出，再通过全球化输出到世界其他地区，因此各国不可能再借助其汇率来使其自身不受影响。

目前，世界所面临的不是“三难选择”，仅仅只是“两难选择”，即如果且只有资本账户直接或间接得到管理，才可能实现独立的货币政策（Rey，2013年）。

雷伊表示，“一个新出现的局面是一个拥有强大全球金融流动性的世界，其主要特征表现为资产价格、资本总流量和杠杆（债务）的经常性大量流动。”

在资本自由流动时，全球金融流动可以约束各国的货币政策，无论其汇率体系如何。

“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你拥有一个灵活的汇率体系，该汇率就可以让你免受金融冲击的影响，从而可以实现独立的货币政策。事实上，这正是通货膨胀目标国一直坚持的观点。但是，如果你拥有我所建议的全球金融流动，那么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你的汇率不可能让你免受影响——你不可能让自己完全封闭起来，”雷伊说。

古林查斯说，“如果她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我们在开放经济体中如何管理货币政策的指导原则。”

何为“三元悖论”？

“三元悖论”或“三难选择”，是指认为一国不可能同时保持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的观点。

该观点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马库斯·弗莱明（Marcus Fleming）和加拿大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于1962年共同提出的，两人共同创建了蒙代尔—弗莱明汇率模型。他们指出，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国内独立货币政策、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这三个要素：只能最多实现其中两个目标。

自此以后，“三元悖论”的理论成为开放经济体的基石之一。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Maurice Obstfeld）和艾伦·泰勒（Alan Taylor）就提出了“开放经济体”这一理论。

在一般层面，开放经济体（在障碍因素极少的全球市场买卖商品、服务和资本资产的经济体）的决策者在宏观经济层面面临三难选择（trilemma）。通常他们会面临三个值得拥有，但又相互对立的目标，即稳定汇率、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执行面向国内目标的货币政策。由于这三个目标中只有两个目标可以彼此相容，决策者必须确定舍弃哪一个目标。这就是所谓的“三难选择”。

“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更像是一个研究议程，而不是一个已经成熟的理论，”古林查斯继续说道。“埃莱娜在杰克逊·霍尔会议的讲话中以及她近来发表的部分文章中只是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而不是提供明确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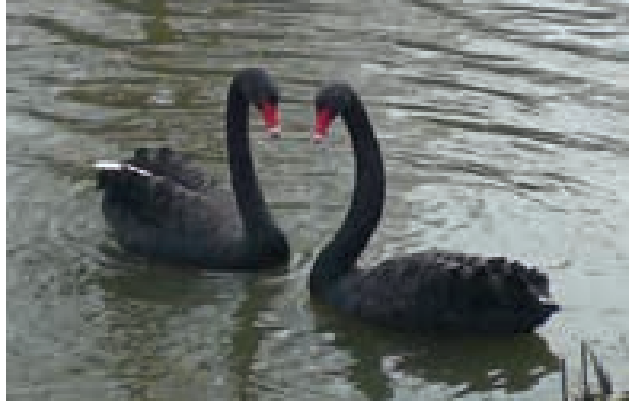
布兰查德认为，雷伊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要。“与此前认为只要让汇率浮动就可免受影响的观点相比，（雷伊的）这一观点完全不同。我认为，这一观点总体是正确的，可能对我们的思维方式，比如新兴市场应如何针对资本流动的剧烈变动做出响应的思考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

各国须加强对资本流动的控制

雷伊认为，各国必须加强对跨国资本流动的管理和监管，这是因为这种资本流动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导致了危机的爆发。

在全球金融危机造成严重破坏后，人们很难弄清或估量各国从金融开放和资本自由流动中所真正获得的好处。事实上，雷伊也表示，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很难确定。雷伊经常向法国财经日报《回声报》（Les Echos）投稿，同时也是法国财长咨询委员会委员。

“目前有数万亿美元跨境流动。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并且开展了数以百计的研究，但经济学家仍难以确定这种资本流动带来的好处。当然，部分资本流动非常有利，这一点完全有可能。同时，部分金融行业获得了大量的好处，这一点也很有可能。不过对于其他人来说，热钱流动并不是风险共担，而是加大了风险的形成。”



位于英国伦敦摄政公园里的黑天鹅。

雷伊认为，如果这些国际资本流动并未带来大量的好处，而只是造成危机，那么“我们就必须限制部分资本流动。通过宏观审慎政策或资本控制，我们可以实现这一目标。我支持这种观点，即每个人的情况都将好转——只是部分金融行业可能除外。”

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宏观审慎政策得到了加强。该政策旨在通过提前采取预防措施以及通过改善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监管，控制或最大限度减小金融体系内部产生的风险。“宏观审慎政策现已非常重要——但问题是它能否在防止下一次危机中发挥作用。”

“她将理论与经验相结合，使得她的研究工作对政策分析发挥了重大作用。”

雷伊表示，近期各国所采取的增加对银行的资本要求以及压力测试都是朝着正确方向的措施。

全球化的不均衡影响

同时，雷伊就国际金融体系的变化方面开展了研究，这些变化包括欧元的创立、欧洲的危机、中国的崛起、全球经济体融入全球流动等。2011年，雷伊及一个专门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就如何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提出了建议，包括加强IMF的作用，允许IMF直接通过商业市场借贷(Farhi、Gourinchas和Rey, 2011年)。目前，IMF只能从成员国政府那里筹集资金。

都柏林三一学院教授莱恩认为，雷伊与巴黎政治学院经济学教授菲利普·马丁(Philippe Martin)共同开展的有关金融全球化的研究工作，值得更多关注(Martin和Rey, 2006年)。雷伊与马丁合作建立了一系列研究模型，分析了具有不对称或不均衡金融体系的各个经济体(欧洲的核心经济体与外围经济体；全球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融合后所带来的影响。

“埃莱娜是影响对金融全球化再认识的经济学家之一，针对金融全球化的好处，她的看法略微不同。例如，在金融全球化可能在新兴市场产生更多的金融危机方面，她的看法就不同，”马丁说。

“在金融全球化在国际调整中的作用和经典的‘三难选择’方面，她的看法也略微不同。在每种情况下，她都对经典的重大问题重新进行分析，表明金融全球化的某些新维度(估值效应，全球金融流动等)可以改变我们对这些经典问题的看法。”

雷伊表示，对于欧洲而言，解决该地区历史遗留下来的债务问题以及推出更为可靠的财政框架体系，是稳定欧元区的两大关键措施。

“除希腊外——这是因为希腊的情况完全不同于欧洲地区的其他国家——欧洲地区必须建立一个更为可靠的财

政框架体系。首先，必须解决危机引发的债务问题。如果某些国家的债务率达到其GDP的130%，由于这些国家‘太大而不能破产’，你就不可能建立一个更为可靠的财政框架体系。”

当被问及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影响时，雷伊表示，中国这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在世界经济中越来越重要，这一点显而易见。

但是，中国的货币人民币要与美元共同被认可为全球货币尚需假以时日。“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但其金融基础设施和银行体系仍然很不发达。因此，人民币要成为与美元同等重要甚至超过美元的货币，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这种状况不可能很快就发生——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未来的“黑天鹅”现象

我们的未来会有“黑天鹅”现象吗？“不过，从本质上讲，我们还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或者说了解得还不多，”雷伊戴着亲切的微笑说道。

“不过，有两件事情明显令人担忧——一是现在存在大量的金融衍生头寸。这相当于一个黑洞。也许是好事，也许不是好事。我们还不清楚它们将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许多人思考的另一件事情是网络安全的问题——这个问题日益严重，我们尚不完全清楚其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黑天鹅’现象。风险就来自于系统内部！”■

杰里米·克里夫特(Jeremy Clift)是IMF出版人，并曾担任《金融与发展》的主编。

参考文献：

Farhi, Emmanuel, Pierre-Olivier Gourinchas, and Hélène Rey, 2011, *Reforming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Gourinchas, Pierre-Olivier, and Hélène Rey, 2005, “From World Banker to World Venture Capitalist: U.S. External Adjustment and Exorbitant Privilege,” NBER Working Paper No. 11563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Martin, Philippe, and Hélène Rey, 2006, “Globalization and Emerging Markets: With or Without Cras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6, No. 5, pp. 1631–51.

Obstfeld, Maurice, and Alan M. Taylor, 2004, *Global Capital Markets: Integration, Crisis, and Growt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y, Hélène, 2013, “Dilemma Not Trilemma: The Global Financial Cycle and Monetary Policy Independence” (Kansas City, Missouri: Federal Reserve Bank).



老挝乌多姆赛省，学生们在课上做笔记。

高瞻远瞩

查尔斯·肯尼

新发展目标能够促使全球各国不断取得进步，提高生活质量

2015 年对于全球发展来说是关键的一年。联合国全体成员国领袖在世纪之交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全球发展目标——千年发展目标 (MDG), 2015 年即是达成此目标的最后期限。对日本、欧洲或北美等地来说, 目前的发展势头似乎出人意料, 但过去的 15 年可能是人类生活质量取得最大进步的时期。特别重要的是, 已有数据显示全球儿童死亡率和绝对贫困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下降。因此, 我们的成就已经远远超越了第一个千年发展目标——将全球范围内每日靠不足 1.25 美元维生的人口数量减半。

联合国即将于今年秋季通过将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2015 年也是这一目标的起始年。这些目标概括了 2030 年之前的发展愿景, 涉及贫困、卫生、教育、安全、环境、治理、性别平等及其他诸多方面。定于今年 7 月于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会议将为这项新议程筹集资金。今年 12 月,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在巴黎举行, 各国将就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做出



承诺，并期望能够找到一个途径，帮助我们远离全球变暖的毁灭性威胁。

未来15年可能会像过去15年一样充满变革。可持续发展目标草案反映了整个世界对更快速进步的渴望。这需要各个国家和各国人民付出前所未有的努力。将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发展筹资会议的宗旨在于明确我们需要做出哪些努力——当然还包括实现这些努力的具体工作。将在巴黎召开的会议对于确保人类的进步符合环境可持续性来说至关重要。但今年最重要的成功条件也许就是发达经济体对可持续发展与其国家利益息息相关这一事实有了更充分的认可：全世界的经济、卫生、福利事业充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将在亚的斯亚贝巴或巴黎召开的会议的失败不仅对发展中经济体是一种不幸，对发达经济体来说亦非幸事。

新千年发展目标

千年发展目标源于各国领袖于2000年在联合国共同发表的《联合国千年宣言》。该宣言中充满了对公正与持久和平的期盼，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以及对自然的尊重。但同时还包括了从联合国十年来的会议中提取的具体目标：靠每日不到1美元（此金额后依据2005年定值美元增长到1.25美元）维生的人口比例减半；确保不论男童或女童均能完成全部初等教育课程；孕产妇死亡率降低3/4且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2/3；遏止并开始扭转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他主要疾病的传播蔓延。这些目标构成了六项千年发展目标的基本内容，另外两项目标是环境可持续性和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过去15年来，全球发展取得了令人振奋的巨大进步，其中包括千年发展目标中突出强调的多个领域。多项衡量指标显示，这种进步的速度是史无前例的。1999—2011年间，发展中国家人口中每日靠不足1.25美元维持生活的人口从34%下降到17%——短短12年间下降了一半。其中很大一部分进展归功于中国惊人的增长表现（该国每日靠

不足1.25美元维持生活的人口从4.51亿下降到840万），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同一时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中国家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59%下降到47%。同样在这12年中，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初等教育净入学率从58%增长到77%。此数据说明按照2000年的招生水平不能进入学校的适龄入学儿童的1/5在仅仅十年之后全部得以入学。2011年，女童的小学入学率为74%，反映了该时期女童和男童在教育机会方面趋于均等。

未来15年蕴藏着持续进步的巨大潜力。

其中，最大的喜讯就是痛失爱子的家长数量显著减少。2000—2013年间，依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在发展中国家出生但于五周岁前死亡的儿童人口比例从8.4%下降到5.0%。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从15.6%下降到9.2%——仅13年间下降了至少40%。在塞内加尔，儿童保健事业的发展尤其迅速，2000年生育一定数量孩子的妇女有超过50%的机率至少失去一个不满五岁的子女(56%)。到2012年，这一风险降低到1/4(26%)。虽然死亡比例仍然很高，但进展的速度也令人震惊。

这些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归功于农村和城市中共养家庭的男性和女性们的辛勤工作，归功于让孩子离开劳动力市场去上学读书，让孩子们在蚊帐中安睡、按时接种疫苗的父母亲所做出的牺牲，归功于提供必要资金和公共物资的各国政府，确保了工作和教育的成功，带来了更好的生活。发展中国家的全力以赴实现了巩固增长所需要的宏观经济的稳定。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的数据显示，2000—2015年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年度收入从约3.2万亿美元攀升至9.3万亿美元。这些收入是实现商业流通和改善生活的卫生与教育服务、道路和电力线以及法律制度的强大支柱。

另一方面，全球合作与交流——商品、服务、人口、知识和观念的流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中国的扶贫工作为例：由外国投资者支持的中国公司向全球各地出口商品，这类公司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外国投资企业占中国进出口的50%以上，占中国工业产值的30%以上。2000—2013年间，出口额平均占全国GDP的30%，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样有助于保持中国出口行业的发展活力。没有国际贸易与投资就无法实现全球最快的绝对贫困下降幅度。

再来看一下移民流动对于发展前景的重要意义。移民向本国国内寄回巨额资金。举例来说，孟加拉国的国外汇款占其GDP的9%，危地马拉占10%，莱索托则达



加纳，教室里的女学生。

到 GDP 的 23%。移民流动促进了投资、贸易和观念的流动，其作用至关重要（见“任重而道远”，《金融与发展》2015 年 3 月号）。2000 年，在美国加州硅谷工作的高级技工中有 1/3 为外国移民，该地区 13% 的新兴企业均为印度侨民创建。此外，这些侨民仍保持着与本国创新人士和企业家之间的联系，这些关系是发展的关键，它帮助当今印度建立起了价值 1460 亿美元的信息技术和商业加工产业，共拥有雇员 350 万，出口额超出了国家总产值的 2/3。

在卫生方面取得的进展中，官方发展援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目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有近一半的家庭拥有蚊帐，睡觉时使用蚊帐的人口从 2000 年的 2% 增长到 2011 年的 33%。其中大部分依靠援助资金得以实现，2000 年以来非洲因疟疾死亡的人口下降了约 1/3，这些蚊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低收入国家中，大部分的疫苗资金也通过援助获得，自 2000 年起疫苗可预防疾病造成的死亡急剧下降：2000—2011 年全球麻疹死亡人数从 54.2 万下降到 1.58 万。

在过去 15 年的进步及为这种进步提供支持的国际合作过程中，千年目标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联合国千年宣言》和千年发展目标的理想激动人心且完全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确实有助于提供发展对话框架，特别是以援助为中心的对话框架。2001—2010 年间捐助国提供的援助在其 GDP 中所占比例从 0.21% 上升到 0.32%。其中多数援助提供给了非洲和社会部门——千年发展目标的两个重点。但是，我和全球发展中心的同事萨拉·戴克思特 (Sarah Dykstra) 研究发现，总体援助流动与卫生、教育和其他千年发展目标指标进展的速度之间的联系很薄弱。哥伦比亚大学的霍华德·弗里德曼 (Howard Friedman) 所作的一项分析显示，过去十年的发展异常迅速，但自 2000 年起

上述比例几乎没再出现加速增长的迹象。

自 21 世纪初以来，千年发展目标各指标的进展略有加快，援助可能从中发挥了微小的作用。听起来这只是一点微不足道的成绩，但从全球层面上看，这一改变仍然救助了数百万个生命或者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这足以证明设置目标是值得再次尝试的实践。

可持续的进步？

未来 15 年蕴藏着持续进步的巨大潜力。当然也存在着风险：哈佛大学的劳伦斯·萨默斯 (Lawrence Summers) 和兰特·布里切特 (Lant Pritchett) 在最近发表的论文中指出“异常快速增长难以持久”，这说明包括中国、印度、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内的国家和地区近年来的强势增长表现可能不会持续下去。如果

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应对收入贫困的发展将会显著下降。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丹尼·罗德里克 (Dani Rodrik) 指出，制造业部门作为东亚“奇迹”国家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再像以往一样创造就业、提高产量——因此削弱了重要的收入趋同机制。更何况气候变化还会给农业生产和沿海基础设施带来难题，猪流感等疾病也向全球卫生和贸易提出了挑战。

另一方面，尽管制造业的份额有所下降，但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十年中的发展仍然十分迅猛。新兴部门——特别是移动通信部门——在此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多数发展中国家已经步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时代，与千年发展目标执行之初相比已经具备更强大的财政实力。发展中国家整体债务在 GDP 中所占比例从 2000 年的 5.9% 下降到 2013 年的 3.1%。2013 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 4.3%，低于 2000 年，这说明宏观经济状况已得到显著改善。如果在未来 15 年中，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增长非常强势，且所有国家始终保持 IMF 乐观的短期预测，这种增长可能会让全球绝大部分人口上升到每日 1.25 美元的绝对贫困线以上。再看看卫生方面：近期柳叶刀卫生投资委员会意识到了定向卫生支出的潜力，到 2035 年将全球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至 1.6% 以下（目前低收入国家五岁以下儿童平均死亡率为 7.6%）。

雄心勃勃的目标

但是，对于起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联合国开放工作组来说，仅靠这种乐观的预测是不够的。它需要各发展领域取得普遍的、前所未有的进步。17 个拟议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 169 个具体目标涵盖了从自然友好旅游到反对针对儿童的暴力，以及从废物管理、手工捕鱼到性别不平等、就

业和互联网接入的各个方面。到 2030 年，目标草案要求我们消灭极端贫困和营养不良；实现充分就业；实现全民卫生保健覆盖；彻底消灭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实现中等教育的普及；确保水、卫生设备、现代能源和通信设备及更多其他设施的普及使用。这些目标还要求所有的进步必须具备环境可持续性。

如果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的目的是关注发展对话，那么除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外，我们很难找出哪个方面不属于这个范畴。并且这个大规模扩展式的、雄心勃勃的目标设置议程将怎样推动发展取得实际进展，目前仍不明确。

但是如果各国想更接近 2030 年目标的各项指标，必须做出前所未有的努力，各跨境流动领域中也应同样开展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合作——不仅（主要）指援助，还包括贸易、金融、移民和技术。因此，将于 7 月举行的发展融资会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发展中国家希望会议能在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前举行，正是为了突显这项规模庞大的发展目标只有在稳固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背景下才能完成。

好消息是于 2015 年 3 月完成的会议宣言的初稿内容广泛、规模庞大。此宣言要求为全部国家提供全球化一

揽子服务，包括社会和基础设施。它突显了增强发展中国家国内发展能力的重要性，特别是确保收入达到 GDP 的 20%。此宣言还要求为改进税收合作、加强多边金融流动、支持私营部门投资、扩大并改善援助、低收入国家出口产品获得良好的市场准入、改进技术共享做出改革与政策承诺。

如果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的目的是关注发展对话，我们很难找出哪个方面不属于这个范畴。

但是此宣言还应提供更多细节：为使更多市场利率资金从捐助国和多边机构（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流出用以支持基础设施部署而设置的指标；捐助国做出承诺为普及国内资源无法合理满足的一系列基本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服务费用提供资金；相关透明度（包括公开预算详情、政府合同、企业最终所有权的



老挝乌多姆赛省，正在洗手的小学生们。



阿根廷农村地区，年轻的学生们是PROMER教育改进计划的受益者。

公共登记册) 的详细信息；移民和技术作为发展工具的强大承诺。

共同的利益

在亚的斯亚贝巴达成的强烈一致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取决于发达经济体是否了解这不是一个利他的问题，而是一个百分利己的问题。2002年，发达经济体参加蒙特雷会议并讨论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全球合作，这些国家可能会问：“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这一次这个过程只会被看作“我们能彼此做些什么？”虽然发展中国家需要全球联系以求取得进步，但现在讨论的问题已经不是说服经济困难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财政部长们慷慨解囊，而是应对一系列只有依靠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才能解决的全球性问题。

以贸易为例：看一看工业化国家的出口目的地是哪里——是发展中世界。美国总出口的3/5流向中等和低收入国家。美国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公司能够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恢复完全依靠出口；2009年，该公司在中国与美国的销售量相同。那么公共财政方面呢？2000年，

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外债占其GDP的83%，这些国家中有2/3外债与GDP之比超过50%。到2011年，平均外债下降至42%，不足1/3的国家的外债与GDP之比超过50%。得到改善的财政状况大大提高了IMF等国际金融机构将在危机期间将资源和注意力集中到富裕国家（如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的能力。

在全球化的世界中阻止流感大流行的唯一途径是在初现端倪时快速应对。

卫生领域：如西非国家（包括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未能成功阻止埃博拉病毒的传播，病毒将在拉各斯、达喀尔及其他地方爆发，届时不仅要面对付出生命的悲惨代价，而且全世界都要为受到破坏的贸易和旅游业付出巨额成本。世界银行的估计数据显示，全球性严重流感疫情将耗资3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为因商业往来受到影响造成的损失——更具致命性的疾病的代价则更为惨重。在全球化



老挝乌多姆赛省，学生们在等待学校供应的午餐。

的世界中阻止流感大流行的唯一途径是在初现端倪时快速应对，这需要当地具备实力强大的卫生系统。

下面谈谈移民：印度 IT 部门的增长有赖于来自美国的技术转移，但美国的经济增长也依靠移民，他们的专利申请约占美国总数的 1/4。而美国的卫生事业依靠世界其他地区，不仅是因为流行病的威胁，还因为在美国工作的护士中有 1/5 在国外接受教育。随着工业化世界的发展，对移民的需求只会不断增长。

最后，谈到可持续发展，发展中国家已经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发展中国家很快会为每年全球 2/3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负起责任，并成为地球上绝大多数生物的栖息地。

目前仍有为数过多的儿童死于易于预防的疾病，而许多幸存的儿童却过着学校不提供教育、国家不提供良好的工作机会、公用事业单位不能提供可靠的水力和电力的环境当中。但自 2000 年以来，全世界在应对这些弊端方面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在未来 15 年中，如果这种进展能够加速实现——在未来数百年中以可持续的方式实现，世界各国将从中受益无穷。因此，我们需要在今夏的亚的斯亚贝巴会议中缔结持久稳固的全球化融资交易，也需要

在其后的巴黎会议中达成坚定有效的协议。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全球合作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全球合作，我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的豪言壮语和远大目标都只不过是空口白话、纸上谈兵。■

查尔斯·肯尼（Charles Kenny）是全球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著有《下降趋势中的正面思考：为什么世界其他地区的崛起是西方世界的福音》（*The Upside of Down: Why the Rise of the Rest Is Great for the West*）。

参考文献：

Friedman, Howard, 2013, "Causal Inference and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 Assessing Whether There Was an Acceleration in MDG Development Indicators Following the MDG Declaration," MPRA Paper No. 48793 (Munich: Munich Personal RePEc Archive).

Kenny, Charles, with Sarah Dykstra, 2013, "The Global Partnership for Development: A Review of MDG 8 and Proposals for 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 CGD Policy Paper 026 (Washington: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Summers, Lawrence H., and Lant Pritchett, 2014, "Asiaphoria Meets Regression to the Mean," NBER Working Paper No. 20573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October).

追求质量

单靠高增长无法改善社会状况

蒙特福特·穆拉驰拉、雷纳·塔普索巴、桑帕闻德·塔普索巴

将强劲的经济增长转化为更好的生活条件，通常被发展中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奉为“圣杯”，过去十年间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强劲。但许多国家的贫困、不平等和失业指标依旧居高不下。增长质量与增长水平同等重要，甚至比增长水平更重要。单靠高增长不会带来更好的社会效果。

包容性增长——惠及所有社会成员——是所谓优质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包容性增长的共性是增长质量，不同的人对增长质量有不同的理解。跟审美类似，对待高质量增长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近几年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状况表明，高增长不一定会带来更好的社会效果。同样地，如果没有稳固的经济增长，良好的社会效果是不会持久的（Berg、Ostry 和 Zettelmeyer，2012 年）。

发展中经济体的优质增长必须有助于实现任何发展政策的最终目标——提高生活水平，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现象。

众多文献表明，实现社会友好型持久高增长的国家更有可能快速提高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参见，例如 Dollar 和 Kraay，2002 年；Sala-i-Martin，2006 年）。因此，优质增长应该涵盖处于增长过程边缘的各阶层人群。相比增长成果的再分配，确保增长覆盖范围广泛和带来更好的社会效果更为重要。

质量的衡量标准

尽管经济学界一致认为单靠增长不会带来更好的社会效果（Ianchovichina 和 Gable，2012 年），但高质量增长仍缺乏严格定义或正式量化。

在最近一篇论文中（Mlachila、Tapsoba 和 Tapsoba，2014 年），我们制定了增长质量指数（QGI），该指数反映了增长的内在特征及其社会维度。



我们的前提是，不是所有增长都会带来有利的社会效果。增长的产生方式对其可持续性和创造体面工作、提高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的能力至关重要。在设计 QGI 的过程中，我们旨在通过专注于其内在特征和理想的社会效果来反映增长的多维性。

QGI 是一个综合指标，设计简单、透明。指标结果来自于对两大基本内容的汇总：增长的内在特征（增长强度、稳定性、多样性及出口导向程度）和社会维度（反映增长带来的理想社会效果）（见图 1）。

增长质量与增长水平同等重要，甚至比增长水平更重要。

强劲、稳定、多样化的出口导向型增长对于遏制贫困而言必不可少 (Dollar 和 Kraay, 2002 年)。不稳定增长会加剧贫困和破坏平等，因为在经济衰退时期，贫困人口的技能退化，当经济走出危机时，退化的技能得不到补救 (Ames 等人, 2001 年)。多样化增长可减少经济表现的波动性 (Papageorgiou 和 Spatafora, 2012 年)，从而有助于减贫。出口导向型增长更有可能通过边做边学、引入先进技术、知识转移、全球市场约束、竞争和外国直接投资等途径提高生产率增长幅度 (Diao、Rattsø 和 Stokke, 2006 年)。这种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也可能使国家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波动的影响，但 QGI 将增长波动性考虑在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这一担忧。

此外，健康长寿和良好的受教育机会是被广泛认可的重要减贫指标 (Sen, 2003 年)。由于数据有限，QGI 省略了包容性的其他关键变量，如就业、不平等和环境

因素。该指数的范围介于 0—1 之间（1 代表优质增长的最高分数），覆盖了 90 多个发展中经济体在 1990—2011 年间的增长状况。

QGI 有什么新特点吗？它是联合国制定的著名的人类发展指数 (HDI) 的变形 (UNDP, 1990 年) 还是其他福利性指标？都不是：该指数与其他指数具有显著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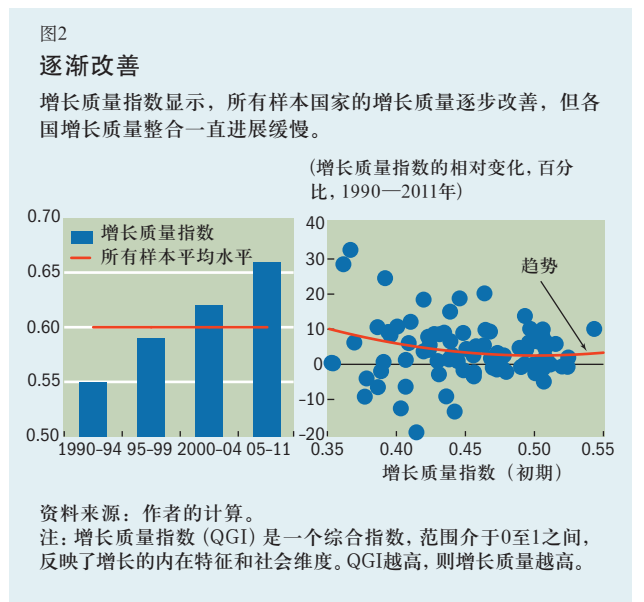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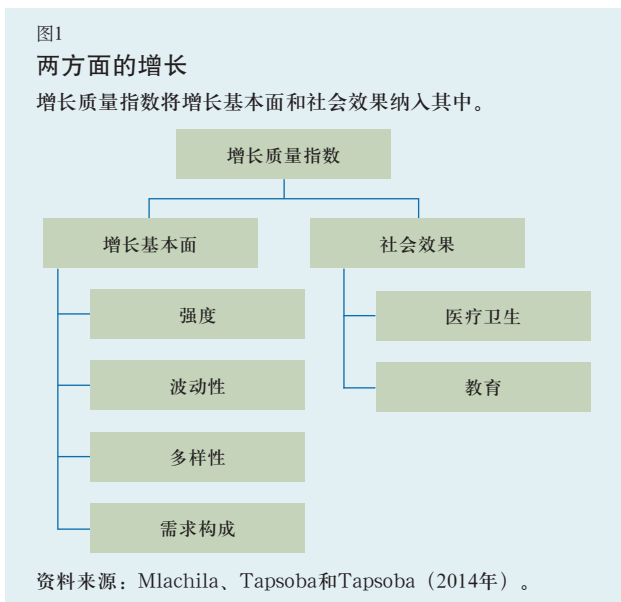
QGI 超越了收入水平，专注于增长的内在特征。HDI 主要根据收入水平而制定，其建立在给定年份中人均收入水平的基础上。可以说，HDI 实际上反映了千年累计增长情况——某给定日期的收入水平是各增长时期的收入水平总和。QGI 的优势在于其能够评估特定时期内一国和多国的增长质量。这一特点使政策制定者能够了解其增长战略是否带来了良好效果。QGI 还能够确定当前或近期政策带来的增长和社会效果。

QGI 也区别于近几年制定的社会进步指数 (SPI, Stern 等人, 2014 年)。相比 HDI, SPI 更侧重接近 QGI 的社会维度的内容，但没有将增长基本面纳入其中，而增长基本面正是 QGI 的核心内容。

QGI 调查结果

我们从 QGI 实证调查中发现了一些重要主题。

过去 20 年间，增长质量不断提升 (见图 2)，这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全球外部冲击缓解 (如贸易条件发生变动)、实施大体利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逐步向“社会友好型”公共支出的转变。这些因素有助于提高增长幅度、减少增长波动性、改善增长结构和提高其带来更好的社会效果的潜力。此外，各国增长质量整合相对缓慢。表现最差的国家往往会逐渐赶上表现最佳的



国家，只是进程相当缓慢。这一点符合增长文献中描述的传统整合假设。换言之，一旦一国的增长质量达到很高水平，持续提高增长质量将变得日益困难——就像提高预期寿命也有生物极限一样。与之相反，QGI 较低的国家往往会以相对更快的速度提高增长质量。持久的社会效益提升需要长期持续的高质量增长——30 至 40 年。中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已在这一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但社会保障网络尚未完全建立。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等许多非洲国家也在增长质量方面取得显著改善，但它们必须长期保持这一势头。

各国和各地区的收入水平差异显著（见图 3）。上中

等收入国家得分最高，其次是下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这一点不足为奇。同样，脆弱国家在增长质量方面面临结构性障碍，通常处于落后地位。

QGI 可能有助于引导发展中国家制定战略，顺利实现增长。

从区域的角度来看，拉丁美洲、中欧和东欧以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在 QGI 方面表现最佳，这主要得益于其在该指数的社会构成上取得了显著改善。拉丁美洲起点薄弱，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面临高贫困率和收入不平等问题，中欧和东欧在向市场经济过渡后，取得了显著的社会进步，从而推高了其 QGI 表现。强劲的出口导向型增长通过技术和创新转移大幅提高了生产率，这成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在 QGI 方面表现突出的主要驱动因素。中东和北非地区紧随其后，这两个地区主要得益于在社会维度上得到改善和相对强劲的增长。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虽然增长强劲，但由于尚未将其转化为更好的社会效果，排名最后。

实证模型表明，政策制定者在提高增长质量方面还有很大空间（见图 4），可通过提高宏观经济稳定性和政治稳定性、制度质量和亲贫式公共支出以及发展金融来实现。此外，更有利的外部环境也会大有裨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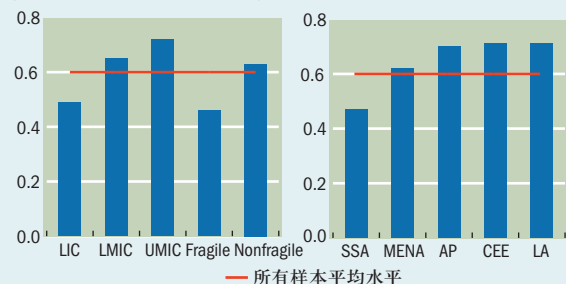
增加分配给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部门的公共资源有助于增强人力资本，这不仅将提高整体经济效益，还能够使每个人获得享受高增长成果的平等机会。大力发展金融行业有助于放宽贷款条件，释放私营部门的潜力，以创造财富和优质工作。外部条件，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将填补国内储蓄短缺，以便进行国内投资，并将加速技术和知识转移。

图3

弱势群体

增长质量指数显示，低收入国家、脆弱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生长质量低于平均水平。

（增长质量指数，1990—2011年）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

注：增长质量指数（QGI）是一个综合指数，范围介于0至1之间，反映了增长的内在特征和社会维度。QGI越高，则增长质量越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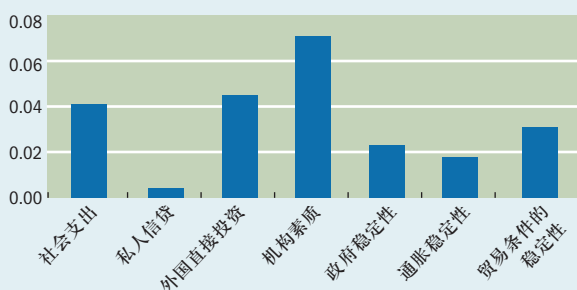
AP=亚洲和太平洋地区；CEE=中欧和东欧；Fragile=脆弱国家；LA=拉丁美洲；LIC=低收入国家；LMIC=下中等收入国家；MENA=中东和北非；Nonfragile=非脆弱国家；SSA=撒哈拉以南非洲；UMIC=上中等收入国家。

图4

掌握控制权

增长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政府机构素质、社会支出和外国直接投资。

（变量变化对增长质量指数的影响，1990—2011年）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

注：增长质量指数（QGI）是一个综合指数，范围介于0至1之间，反映了增长的内在特征和社会维度。QGI越高，增长质量越高。对社会支出、私人信贷和外国直接投资在GDP中的占比：提高5个百分点。对于机构素质、政府稳定性、通胀稳定性和贸易条件的稳定性：改进1个标准偏差。

改进空间

虽然 QGI 有利于目前对不平衡增长进行分析，但还可使用几种方法来改进这一指数。QGI 有潜力成为政策制定者监督包容性增长进度的一个及时、经济高效的工具。但与所有指数一样，只有良好的基础数据才能使其完善。社会数据的质量极差并且参差不齐，所以我们不得不进行多次修改，并使用 5 年平均值来进行计算。如若将不平等的衡量标准和劳动力市场变量纳入其中，QGI 指数可能会有所改进。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提醒一句：QGI 不能反映长期可持续性。简言之，该指数不能预测一国的当前政策——可能会提高当前的增长质量——是否会在以后导致经济灾难或环境灾难。例如，一国通过迅速耗尽自然资源或增加公共债务，可能会提高其增长质量。

QGI 在探究更好地衡量增长质量方面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可能有助于引导发展中国家制定战略，顺利实现增长。■

蒙特福特·穆拉驰拉 (Montfort Mlachila) 任IMF非洲部的顾问，雷纳·塔普索巴 (René Tapsoba) 和桑帕闻德·塔普索巴 (Sampawende Tapsoba) 是IMF财政事务部的经济学家。

参考文献：

Ames, Brian, Ward Brown, Shanta Devarajan, and Alejandro Izquierdo, 2001, "Macroeconomic Policy and Poverty Reduction"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World Bank).

Berg, Andrew, Jonathan D. Ostry, and Jeromin Zettelmeyer, 2012, "What Makes Growth Sustained?"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98, No. 2, pp. 149–66.

Diao, Xinshen, Jørn Rattsø, and Hildegunn E. Stokke, 2006, "Learning by Exporting and Structural Change: A Ramsey Growth Model of Thailand,"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Vol. 28, No. 3, pp. 293–306.

Dollar, David, and Aart Kraay, 2002, "Growth Is Good for the Poor,"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7, No. 3, pp. 195–225.

Ianchovichina, Elena, and Susanna Lundstrom Gable, 2012, "What Is

Inclusive Growth?" Chapter 8 in Commodity Price Volatility and Inclusive Growth in Low-Income Countries, ed. by Rabah Arezki, Catherine A. Pattillo, Marc Quintyn, and Min Zhu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Mlachila, Montfort, René Tapsoba, and Sampawende Tapsoba, 2014, "A Quality of Growth Index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 Proposal," IMF Working Paper 14/172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apageorgiou, Chris, and Nikola Spatafora, 2012,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in LICs: Stylized Facts and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2/13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ala-i-Martin, Xavier, 2006, "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Falling Poverty and . . . Convergence, Period,"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1, No. 2, pp. 351–97.

Sen, Amartya, 2003, "Concepts of Poverty," Chapter 2 in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Oxford: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Stern, Scott, Amy Wares, and Sarah Orzell, with Patrick O'Sullivan, 2014, "Social Progress Index 2014 Methodological Report" (London: Social Progress Imperativ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1990,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LUMBIA | SIP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PROGRAM IN ECONOMIC POLICY MANAGEMENT (PEPM)

Confront global economic challenges with the world's leading economists, policymakers, and expert practitioners, including Jagdish Bhagwati, Guillermo Calvo, Jan Svejnar, Andrés Velasco, and many others.

A 12-month mid-career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ocusing on:

- rigorous graduate training in micro- and macroeconomics
- emphasis on the policy issues faced by developing economies
- option to focus on Economic Policy Management or International Energy Management
- tailored seminar series on inflation targeting,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financial crises

The 2016–2017 program begins in late May of 2016. Applications are due by January 5, 2016.

pepm@columbia.edu | 212-854-6982; 212-854-5935 (fax) | sipa.columbia.edu/pepm
To learn more about SIPA, please visit: www.sipa.columbia.edu



杯子是 半空 还是 半满？

美国内华达州米德湖，严重干旱使峡谷岩壁上留下了矿物沉积。

卡尔帕纳·科克哈尔、凯瑟琳·帕蒂略、孙艳

“井干了才知道水的价值。”
——托马斯·富勒

制定适当的激励机制有助于 应对水资源挑战，同时保护 贫困人口

巴西圣保罗最大水库系统已近枯竭。近一个世纪来的人口增长、森林采伐、河流污染以及巴西东南部最严重的干旱使许多居民被迫忍受不时发生的供水中断。有些地方甚至连续数天无水供应。居民们已通过自行钻井或蓄水等办法洗衣服、冲厕所。

在数千英里外的北部，美国的部分地区也遭遇了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原因是几十年来的非可持续性消耗和干旱的气候条件。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四周已出现“浴缸线”，标示着湖水水位曾经的高度。除已实施的灌溉和绿化用水的严格限制外，加州监管机构还于2015年4月通过了意义重大的强制性用水削减规定，违反者将处以巨额罚款。当地农民预计将有

一百万英亩农田因此荒芜，几乎达到上年的两倍。

2015年1月，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洪涝灾害摧毁了马拉维这个人口密集的低收入国家，农业是马拉维人民的生活支柱。这场洪水造成将近25万人流离失所，庄稼、村庄和牲畜被毁。马拉维总统彼得·塔里卡(Peter Mutharika)称全国有一半地区为灾区。

以上水资源问题也困扰着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无论何时何地，全球各地的人口都面临着可用水资源获取机会的限制。全球范围内共有12亿人口，或者说每6人中就有1个生活在供水不足的地区，其中大约9人中有1人无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几乎每分钟都有儿童死于水资源相关的疾病。

水资源短缺会给经济、社会和环境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因为水是农业生

产的重要资源，是其他工业的主体，水资源短缺和供应的不稳定性可能导致食品不安全、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增长受限。例如，世界银行（2007年）的数据显示，1981—2004年间与水资源相关的冲击可能致使莫桑比克的GDP增长每年下降1.1个百分点。

安全的饮用水和先进卫生设备的缺乏还会以多种其他方式抑制发展，具体包括疾病患病率的增长、健康和营养状况的日益恶化以及女性在教育及付酬活动中的参与率的降低——因为女性通常负责家庭用水的收集和搬运。水资源的退化可能还会导致多个部门活动衰退，如依赖环境质量的旅游业。

但是，IMF的最新研究显示，健全的政策和制度已经帮助水资源缺乏的国家成功对这种稀缺的自然资源施行了管理。这项研究发现，低价出售往往会导致过度使用和过度供应。通过制定适当的激励机制，政府能够有效地应对这些问题，同时满足贫困人口对水的需求。

干渴的世界

许多国家不断上涨的用水需求给水资源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全球可供人类使用的淡水资源储备非常有限且分布不均；其中60%以上的水资源主要集中在10个国家。从人均可用淡水量来看，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可用淡水量仅为拉丁美洲可用淡水量的一小部分。即便在总体水资源充足的国家中，仍有部分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而且每个地区的水资源可用性在全年不同阶段也存在很大差异，一年中的气候变化、季节变化、干旱和洪水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正如巴西东南部和加利福尼亚的案例所示，全球许多地方已遭遇水资源短缺问题，数百万人口的基本用水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世界资源研究所发现，全球共有36个国家的水资源压力较大，使用量占每年可供应量的40%以上（Gassert, 2013年）。这种用水量可造成特定地区的水资源短缺，导致环境破坏。

此外，需水量将随着人口增长、城市化推进和经济的扩张不断增长。虽然有些证据表明随着国家变得更加富裕，水资源的使用水平会有所下降，但长期情景预测得出的结论是更加富裕后，许多国家的水资源用量将出现大幅增长，目前的供应量将无法需要。海水淡化和循环利用等技术上的进步缓解了部分发达国家的供水限制问题，但是这些技术成本高昂，并且需要庞大的前期投资。气候变化及供水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足可能会加剧当前的水资源供求失衡问题。

水资源的独特性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因素造成水资源定价较为复杂。水是一种可以连续使用的异质性商品；它可以是私人商品（例如，在购买瓶装水或通过管道输送到户时），也可以是公共商品（例如，个人从湖水、河水和地下水含水层提取时）。由于水的体积庞大，运输成本高，所以水的运输和储存常常需要巨额初期投资和持续的维护成本，这些都难以精确地反映在用户的用水收费上。

此外，长期以来全民事用水权被视为一种人权，全球公共政策目标对此做出了明确说明。为水资源定价的工作需谨慎执行，以避免妨碍这一目标的实现。此外，外部因素（如水的使用对环境的影响和其他用户可用水量的减少）很难在水的定价中体现，这主要是因为用水量，尤其是地下水的提取量难以监测。

渗漏系统

在许多国家中，水资源的管理就像一个渗漏的管道系统。监管部门给予特权或支持的水资源消耗超过了合理份额，未能实现具有更高社会和经济价值的使用。财政资源往往大量用于针对性不强的隐性补贴当中，适当的供水基础设施的维护与投资或用于提高效率的技术的发展均成为管理不善的牺牲品。这种状况将会加剧水资源的短缺或导致很大一部分人口无水可用。

现有价格信号通常是非常不准确的。IMF研究发现，许多国家的公共供水公司仅收取覆盖全部供水成本所需金额的一小部分作为维护费。依据价格差估计值和用水量，2012年水资源补贴总计近5000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0.6%。发达经济体的水资源补贴占GDP的0.3%，亚洲、中东和北非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水资源补贴为其GDP的1.5%以上，有些国家的比例为5%。

用水补贴也存在不公平现象。我们很容易看出将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备的补贴提升到基本水平的道理，但这些补贴往往涵盖了实际需要之外的其他使用，且覆盖范围延伸到了收入水平足够支付供水费用的人群。事实上，由于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里贫困人口缺乏供水和卫生设施或者获取机会低于收入较高的消费者，因此相对富裕的人口往往从水资源补贴中获益更多。例如，佛得角、印度和尼加拉瓜为最富裕的家庭提供平均价值3美元的用水补贴，而最贫困的家庭仅得到价值1美元的用水补贴。

水资源补贴很少显示在政府预算报告中，也很少获得适当的资助。相反，它反映在维护资金不足、供水基础设施的恶化和公用事业的财务损失中。就像一条年久失修的管道最终破裂，真正的供水成本问题最终会暴

具有最大使用价值的物品的交换价值往往很小或者不具有交换价值；相反，具有最大交换价值的物品的使用价值往往很小或者不具有使用价值。

——亚当·斯密

露出来。物质损失和低效管理的共同作用耗尽了本应作为投资资金的补贴。一项世界银行的调查显示，这些问题大幅降低了公共事业的潜在收入——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降低了15%，发展中经济体则平均降低了30%以上（Kingdom、Liemberger和Marin，2006年；见图1）。

填补漏洞

制定适当的水价有助于保持竞争性需求和供给不足之间的平衡。定价改革可以促进节约、投资及新型节水技术的开发，尤其是在人均用水量相对更多的发达经济体中。在发展中经济体，改革能够增加公共供水公司的融资、推动投资并扩大使用范围。同时，应确保定价改革所调动的资源不被转为他用，这一点至关重要。

就像一条年久失修的管道最终破裂，真正的供水成本问题最终会暴露出来。

定价改革的规划应以保护贫困人口为宗旨。是否能够找到最理想的途径取决于国家的行政管理能力和弱势群体对现有水资源网络的使用状况。其中一个方案是为基本水资源应用提供补贴的梯度水价结构；要使贫困人口从中受益，需要较高比例的家庭与公共供水网络连接。其他方案包括公共供水补贴或低收入消费者的供水接入补贴，以及为贫困家庭提供有针对性的收入援助。

布基纳法索是IMF此次分析的五个个案研究国之一。该国推行了渐进式饮用水收费制度——例如，高用量用户补贴低用量用户以及为一部分卫生成本提供补贴。新加坡这个自然水资源缺乏的城市型国家不存在无补贴的基本用水。相反，新加坡政府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了有针对性的社会援助。

提取费用是有助于用水需求合理化和应对外部因素的另一个工具。由于大量水资源都是用户从地下直接提取，并非通过公共供水公司购买，所以收取提取费是非常重要的。

许多发达国家都征收水资源提取费，例如，德国已采用了这种收费制度，旨在实现降低提取量和提升环保收益双重目标。在比利时的佛兰德斯地区，提取的地下水总量越大，收取的费用就越高。加拿大大部分省份均向用水大户征收许可费。

监管改革也有助于推广清洁技术的应用、改善水资源管理，将水资源分配到生产率最高的应用领域。例如，在澳大利亚，水权市场的建立已促使该国转向更高附加值的农业生产和采用更高效的灌溉技术（Bjornlund和McKay，2002年）。

许多国家都应该提高其对供水基础设施的投资，依据各国国情设定投资重点。存在用水困难的发展中经济体必须扩大供水分配网络，提高储水容量。许多已经普及用水的国家需要更新老化基础设施，维持或开启未来水资源的供应。对所有国家来说，应将确保足够的维护支出作为第一要务，在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实现这一目标可能需要额外的财政资源。

将水资源委托实力雄厚的独立机构进行管理——这种做法已帮助许多国家解决水资源问题。例如，新加坡的自治公共事业董事会负责水循环的所有方面（如采集、生产、分配和回收），在供水来源多样化、推动节水技术研究和促进节约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本世纪初期，布基纳法索的公共供水单位“国家水资源和卫生设施办公室”与政府签订了以业绩为基础的服务合同，为供水管理带来了丰富的私营管理经验。依据各项目成本效益能力的评估结果，认真选择投资项目，投资人在提供融资方面发挥主要作用。这些改革大幅增加了获得水资源的机会。

从大量消耗到节约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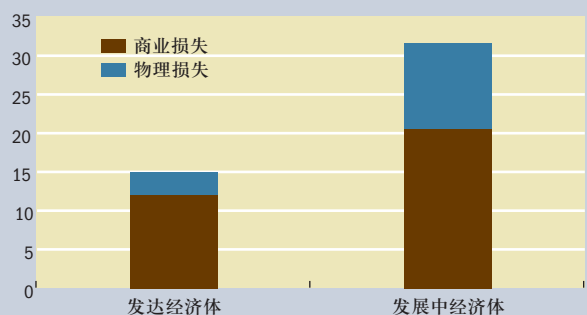
应该对直接或间接增加耗水量的其他政策进行改革，作为水价改革的补充。许多国家农业用水效率低下均源于其他政策，具体包括农业价格支持、贸易限制及土地和金融市场的僵化。

巴基斯坦自然水资源丰富，但仍是全球最缺水的国家，该国水资源主要用于农作物的灌溉，农业每年可消耗95%的可用地表水。虽然农业产值占巴基斯坦全国GDP的20%，全国农业工作者占总人口的40%，但总体上看农业仍属免税部门。灌溉费用按土地面积而非实

图1

资金浪费

公共事业单位因渗漏或未收取消费者费用或两者共同作用遭受的收入损失——浪费了本可以用于供水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城市供水百分比）



资料来源：Kingdom、Liemberger和Marin（2006年）；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际用水量计算，阻碍了高效技术的采纳和节水型作物的选择。

能源价格补贴也给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带来了阻碍，因为这些补贴降低了地下水的提取成本。在也门，2014年之前实施柴油燃料补贴人为地拉低了用于灌溉的地下水的抽取成本。这种补贴促使农民种植耗水型作物，这是造成过去十年间人均可用水下降20%以上的原因之一。事实上，柴油燃料（用于抽取灌溉用水）价格较低的国家往往耗水量更大（见图2）。

从更根本层面上看，政策制定者必须确保在水的定价与使用中考虑到水资源的必要性和有限性。实现稳健的水资源管理需要综合性的、全面的方法：经济、社会和环境政策应保持一致、相辅相成。此外，还需要地方、区域和国际层面的各利益相关方拥有所有权和共同努力。

IMF能够——并且应该——发挥辅助作用，确保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利于实现稳健的水资源管理。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方法是为各国提供如何加强公共投资管理系统的建议，各国可采纳这些建议，提供足够的维护资金并为公共投资安排更加合理的优先顺序。IMF可与具备水资源问题专业知识的机构（如世界银行）合作，评估水资源问题给贫困和弱势群体、经济增长和公共财政带来的影响，从而提升各国对这方面的意识。

此外，IMF能够鼓励宏观经济政策帮助各政府制定适当的激励措施，同时为贫困人口提供保护。具体而言，应使用有针对性的社会支持替换不适当的能源和水资源补贴，这些补贴会带来负面影响，违背了政策制定者的预期目标。其目标是各国成功制定能够创造财政空间或促进融资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有助于提高与水资源相

关的投资，增加获得水资源的机会，加强供水变化的弹性，以及维持或开启未来水资源的供应。

布基纳法索的情况正是如此。30年前，巴格雷河岸仅支持自给农业。随后政府在纳卡那贝河上修建了大坝，大型水库由此形成，政府还制定策略，鼓励该地区的经济活动。如今，纳卡那贝河及周边地区支持多样化农业生产、鱼类孵化场、生态旅游和发电，所有这些都吸引私营部门的投资，创造就业机会。流行疾病已被根除，食品供应充足，家庭经济安全状况得到改善，入学率大幅提高。

布基纳法索取得的进步展现了健全的水资源管理政策和制度带来的好处。虽然该国水资源稀缺，降雨量变化大，但受到上文提到的定价和制度改革的推动作用，过去20年中该国获得饮用水的机会增加了一倍。

所以，杯子到底是半空的，还是半满的？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布基纳法索所取得的进步给了我们乐观的理由。制定适当的激励机制将会实现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各方面共同努力有助于提高目前的生活水平，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护好珍贵的水资源。■

卡尔帕纳·科克哈尔（Kalpana Kochhar）是IMF亚太部副主任。凯瑟琳·帕蒂略（Catherine Pattillo）是IMF战略、政策和检查部副主任，孙艳（Yan Sun）是该部副组长。

本文基于由Kalpana Kochhar、Catherine Pattillo、Yan Sun、Nujin Suphaphiphath、Andrew Swiston、Robert Tchaidze、Benedict Clements、Stefania Fabrizio、Valentina Flamini、Laure Redifer和Harald Finger撰写的IMF员工讨论记录“Is the Glass Half Empty or Half Full? Issues in Managing Water Challenges and Policy Instruments”。

参考文献：

Bjornlund, Henning, and Jennifer McKay, 2002, “Aspects of Water Market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Experiences from Australia, Chile, and the US,”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No. 4, pp. 769-95.

Gassert, Francis, Matt Landis, Matt Luck, Paul Reig, and Tien Shiao, 2013, “Aqueduct Global Maps 2.0,”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Washington).

Kingdom, Bill, Roland Liemberger, and Philippe Marin, 2006, “The Challenge of Reducing Non-Revenue Water (NRW)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ater Supply and Sanitation Sector Board Discussion Paper No. 8* (Washington: World Ban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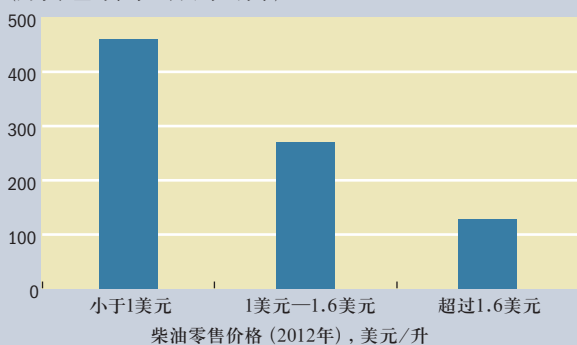
World Bank, 2007, “Mozambique Country Water Resources Assistance Strategy: Making Water Work for Sustainable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Paper* (Washington).

图2

不适当的激励机制

通常，柴油燃料（通常用于抽取灌溉用水）价格较低的国家耗水量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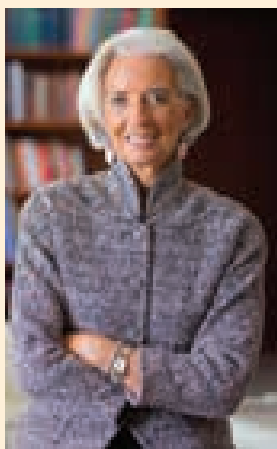
（用于农业的取水量，人均立方米）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2012年）。
注：数据涵盖发达经济体；独联体；亚洲发展中国家；欧洲新兴国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东、北非、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

发展之路

国际合作、承诺和灵活性对改善全球状况至关重要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Christine Lagarde)
是IMF总裁。

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曾说，“如果你不知道航行的方向，什么风对你来说都是无益的。”两千年后，这句格言时刻提醒我们设定目标的重要性。虽然经常有人对梦想冷嘲热讽，但事实上，目标弥足珍贵——集中精力，建立伙伴关系，并最终找到解决方案。

塞内加的这句名言在今年尤为重要，因为今年国际社会将汇聚一堂，就2015—2030年及以后的下一步发展达成一致。届时，将全面做出关键决策——从融资框架到环境目标，再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可持续发展目标将接替千年发展目标(MDG)。至少在一个世代的时间里，这样的机遇很可能不会再有。

自2000年通过千年发展目标以来，国际社会取得了显著进步。其中包括三个主要的“减半”——全球贫困人口数量减半、儿童在五岁前死亡的可能性减半以及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的人口占比减半。但进展程度不一。众多发展中国家已达到世界“前沿”地位，而一些脆弱的和易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却远远落在后面，着实可悲。

我们也必须考虑在过去15年间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通过技术、贸易和金融发展，全球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导致各国溢出效应更加明显，相互依赖性增强。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而发达经济体受到大衰退重创，遭遇挫折，两者形成鲜明对比。

指导原则

通过回顾过去，审视现在，思考未来，我发现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三个指导原则：

合作：实现发展目标需要全面合作，以便落实适宜的政策并提供所需资源。这就意味着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通力合作——并与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合作——包括国内合作和国际合作。

承诺：各合作伙伴需要表明持久承诺，该承诺将持续至2030年以后。换句话说，各国政府点燃火花，但火花必需持久，才能使火焰熊熊燃烧。

灵活性：在可能的情况下，必须灵活开展发展工作。各国必须根据各自的国情，制定政策并留有空间，以便随着世界的发展不断做出调整。

我们如何将这些指导原则转化为实质性的行动，以便解决贫困问题和促进发展？

国家重点工作

首先，我需要明确一点——虽然需要合作，但发展中国家已做好一切准备，推动自身发展。

获得基本权利是前提。这意味着各国需制定完善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控制通胀、繁荣—萧条周期和公共债务。良好的财务状况和充足的国际储备使各国做好准备，应对其控制有限甚至无法控制的负面冲击。强大的机制会提振信心和提高可预测性，来支持政策落实和私人投资。具备这些基本条件后，各国还必须采取额外措施来支持发展。

汲取收入是重中之重。虽然各国应具备灵活性，但征税必须简单并得到有效管理，税基必须广泛。提升采掘业的征税透明度也至关重要。

一旦收入提高，必须高效、有效地利



用这些收入来推动发展，同时，这些收入必须得到强大的公共财政管理的支持。发展中经济体通过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多数为私人投资)来应对迫切的基础设施需求，因此，增强项目管理和采购实践尤为重要。

私营部门确实是实现发展的重要合作伙伴。例如，通过保护债权，发展金融部门可扩大个人和小企业享受基本金融服务的机会。精心设计的税收和贸易体制有助于吸引外国投资，取得重大发展成果。

除了这些措施之外，发展中经济体还必须采取进一步措施，使发展带来的好处惠及各阶层人群并使环境不遭受破坏。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让更多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和实现合理碳定价，这些都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途径。

国际支持

我知道上述任务十分艰巨。但国际社会有责任通过营造有利环境和就全球性挑战采取协调行动来支持这些工作。国际合作伙伴之间的合作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一项职责和义务。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充满溢出效应和溢回效应的世界中，金融、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等多股力量影响全球。其结果可能是变革性的，也可能是毁灭性的。使其向正确方向发展的关键就是加强国际合作。

除需要制定负责任的政策来提高全球经济和金融弹性之外，我还发现国际合作承诺可在其他五个重点领域支持发展：

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将受益于以规则为基础、非歧视和公平的全球贸易体系。

收入：加强国际税收合作，解决避税问题和削弱各国之间的税收竞争，从而保障发展中经济体的收入，这对于社会和发展支出而言十分重要。

援助：有援助预算能力的发达经济体应将增加援助列为重点工作，这对于许多世界上最穷的国家而言至关重要。

债务：强化主权债务危机处理框架来推动及时高效地解决问题，是重中之重。IMF 制定了一项推动改革的有效的工作计划。

环境：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有效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包括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和帮助低收入国家适应气候变化。

每个重点领域的英文首字母合起来正好是“贸易”(trade)一词，这一点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因为“贸易”一词的现代含义——贸易本身就是优先事项，而是因为其深层语义，即一种交换和合作形式，而合作是全球发展工作的基础。

IMF 的作用

从各国和全球来看，我发现 IMF 在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一个维持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杰出机构，IMF 已经全面参与了发展事宜——与我们的 188 位成员国就政策设计和落实、能力建设和贷款给需要帮助的国家展开合作。

国际合作伙伴之间的合作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一项职责和义务。

但我们仍在不断寻找各种方法，来提供更多帮助。在这关键的一年，我承诺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 IMF 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支持：

金融：我们将探索各种方法，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帮助其应对外部冲击。具体而言，我们将加大关注最贫困和最脆弱的国家，为其提供帮助。

政策：为了推进使更多人参与发展进程这项工作，我们将加大努力，把不平等、性别歧视和获得贷款纳入我们的国家层面建议。利用合作伙伴机构的专业知识将至关重要。

能力建设：我们将推进能力建设，并在各国投资开发经济发展潜力的过程中为其提供建议。技术援助将侧重最需要的领域，包括支持收入汲取和基础设施投资。我们也将加大对最需要帮助国家的援助力度，主要为脆弱和易受冲突影响的国家。

我们必须，也终将会兑现在上述三个方面的承诺。

塑造未来的机会

我在本文开始提到的塞内加是一位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今天，人们通常将斯多葛主义的主要信仰之一描述为“事实胜于雄辩。”

国际社会在为如下三场会议做准备时，必须牢记上述观点：7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发展融资会议、9月在纽约举行的发展目标峰会和12月在巴黎举行的环境目标大会。这三场会议将提供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我们必须把握塑造未来的机会。

如果我们想取得成功——不仅在 2015 年，而且从 2015 年到 2030 年及以后——我们必须遵循三个关键原则：合作、承诺和灵活性。■

全球 目标

各国政府提出17项目标以应对全球挑战

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将在9月份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接受一系列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世界各国政府在未来15年将要达到的目标、具体分目标和指标。提出的17项目标包括终结贫困和饥饿、让城市更安全、保护海洋、减少不平等和创造就业。除减少贫困之外，可持续发展目标还应该引导资金和政府政策指向其能最大限度发挥作用的领域。

可持续发展目标将代替八个千年发展目标(MDG)，

后者是各国政府在2000年达成的，并将在2015年到期。狭义的千年发展目标旨在到2015年使贫困人口减半并提高世界最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随着千年发展目标最后期限的临近，使极端贫困人口减半的这一重要目标已在2010年提前实现，但仍有近10亿人口处于极端贫困——按照世界银行每天1.25美元的标准衡量——并且超过8亿人口缺乏足够的食物。

2000—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

1

根除极端贫困和饥饿

2

普及初等教育

3

促进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利

4

降低儿童死亡率

5

改善孕产妇保健

6

与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作斗争

7

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

8

建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本文由《金融与发展》的高级编辑娜塔莉·拉米雷斯-丢梅那(Natalie Ramírez-Djumena)撰写。

2016—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尊严

- 1. 终结贫困
- 2. 终结饥饿



繁荣

- 7. 确保获得负担得起的和可持续的能源
- 8. 促进所有人拥有体面工作
- 9. 构架有弹性的基础设施并鼓励创新
- 10. 减少不平等
- 12. 确保可持续的消费



人口

- 3. 确保福祉
- 4. 确保优质教育
- 5. 实现两性平等
- 6. 确保所有人能获得水和卫生设施
- 11. 让城市和居住点更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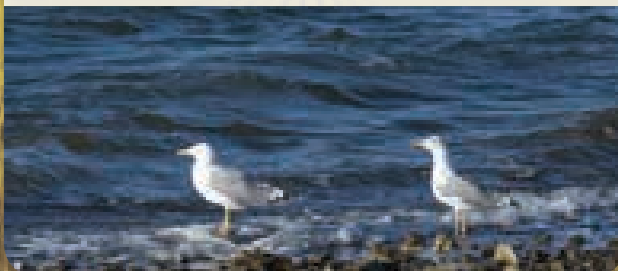
公正

- 16. 促进社会和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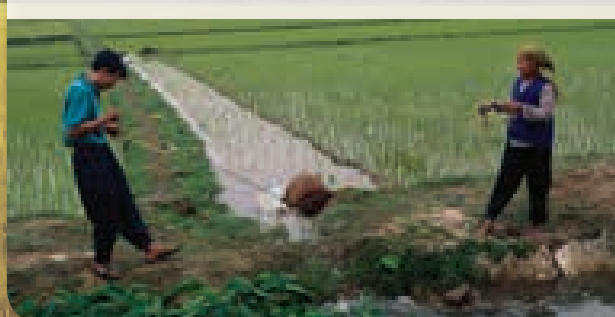
地球

- 13. 阻止气候变化
- 14. 保护海洋
- 15. 爱护地球



伙伴关系

- 17. 增强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





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残骸。

恐怖主义的危害

苏布哈予·班德亚帕德耶、托德·桑德勒、杰夫·雅那斯

恐怖分子不仅会直接造成人员伤亡，更会引发无数经济问题

新技术使交通成本降低，也增加了各国之间贸易和资本的流动。但是，正是这种促进国际经济增长的技术为恐怖主义大开方便之门，让其得以在各个利益紧密相连的国家之间传播。恐怖主义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区问题。恐怖分子可能在数千英里以外发动袭击，造成大面积破坏。

恐怖主义的影响或许会非常直接，让人不寒而栗。居民被绑架或杀害、管道被破坏、炸弹在市场、公交车和餐厅爆炸，造成严重破坏。但是，恐怖主义的破坏性远不止人类伤亡和物质损失。它可以给国家和经济带来巨大的间接伤害，比如，为确保雇员和客户安全而增强安保措施或提高保费，从而导致经济交易成本不断上涨。2000年，美军科尔号驱逐舰在也门遭遇恐怖袭击，2002年法国油轮兰堡号同样在也门遭遇恐怖袭击，这些袭击严重损害了也门的船运业，导致在该航线航行的船

舶的保费上涨3倍，甚至令许多船舶彻底绕道也门(Enders和Sandler, 2012年)。

我们在本文中研究了恐怖主义造成的经济负担。这种负担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我们主要集中在三种：国民收入降低和增速放缓效应、外国直接投资缩水以及对国际贸易的不同影响。

破坏生产

经济研究人员发现，相较于贫困且单一化的小经济体，富裕的多元化大经济体更容易抵御恐怖袭击带来的后果。

在多元化经济体中，如果恐怖主义破坏了某一部门的生产活动，资源会很轻易地流到另一个未受影响的部门。此外，较富裕经济体拥有更多更好的资源来采取反恐行动，这些行动势在必行，且估计会遏制恐怖活动。

相反，小的发展中经济体专注于几

个部门，或许不会具有同样的弹性。劳动力或资本等资源可能从一个受影响的部门流到该国内部生产率较低的业务之中，或完全流入另一个国家。此外，发展中经济体可能缺乏可以在反恐行动中使用的专业资源，如监控设备或拥有先进技术装备的警察部队或军队。正因如此，恐怖威胁一直存在，进而吓跑潜在的投资者。对这样的国家进行恐怖袭击，可能会带来更大、更长久的宏观经济影响。

比如，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的大规模袭击造成了约800亿美元的损失。尽管损失巨大，但是与美国2001年近10.6万亿美元GDP相比，这微不足道（占比不到0.1%）。同样地，布隆伯格、海斯和奥芬达斯（Blomberg、Hess和Orphanides，2004年）发现，平均而言，1968—2000年间跨国恐怖袭击给177个国家造成的影响有限。年人均GDP增长下降0.048%。

在哥伦比亚和以色列等小国家以及西班牙巴斯克自治区等地区，跨国恐怖袭击的影响更可怕。在西班牙巴斯克自治区，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活动已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恐怖主义猖狂的时期，巴斯克自治区的人均GDP下滑10%以上（Abadie和Gardeazabal，2003年）。此外，恐怖主义对各个经济体的影响各不相同，这取决于他们的发展阶段。盖布罗夫和桑德勒（Gaibulloev和Sandler，2009年）以42个亚洲国家为样本，将其分成7个发达经济体和35个发展中经济体。他们估算，恐怖主义并未严重阻碍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同时，他们发现每发生一次跨国恐怖主义事件（每100万人），受到影响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就会降低约1.4%。这些研究结果进一步论证了上述观点，即相较于更富裕、更多元化的国家，小型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更易受恐怖主义的影响。

吓跑投资者

如果一个特定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增多，资本投资的预期回报会下降，导致投资转向其他地区。这减少了生产资本的存量，也阻碍了提高生产率技术向受影响地区流动。

比如，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1991年，恐怖主义事件导致西班牙的外国直接投资净额下滑13.5%，希腊下滑11.9%（Enders和Sandler，1996年）。事实上，因恐怖主义导致的生产性资源损失可能会在初始数字的基础上翻好几倍，原因是潜在外国投资者会将其投资转向其他他们预计更为安全的地点。阿坝第和伽迪亚扎巴尔（Abadie和Gardeazabal，2008年）的研究显示，一旦人们感知到恐怖主义风险出现些微上升，一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净存量就会出现大幅下滑，并对其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我们对78个发展中经济体1984—2008年的情况进

行了分析（Bandyopadhyay、Sandler和Younas，2014年），发现如果以平均每10万人中发生一次恐怖事件为标准，那么一旦这些事件出现小幅上升，一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净额就会急剧下滑。如果恐怖事件发生在国外或涉及受影响国国内的外国人士或国外资产，净投资额也会出现类似的剧烈下滑。此外，我们还发现，加大官方援助流动可以大幅抵消恐怖事件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援助加大会让受援国加强反恐力度，使反恐行动更为有效。

在1970年至2011年间遭受国内或跨国恐怖事件次数多于平均数的国家中，多数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或外国援助少于122个样本国家中的平均数（见表）。虽然难以查明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但该表却显示恐怖主义与

恐怖主义的抑制效应

在恐怖袭击次数超过平均数的国家中，多数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和援助水平较低。

	国内恐怖袭击事件	跨国恐怖袭击事件	FDI (占GDP的百分比)	援助 (占GDP的百分比)
阿尔及利亚	27.17	2.93	0.76	0.60
安哥拉	*	1.74	6.57	3.32
阿根廷	10.31	5.79	1.48	0.06
孟加拉国	10.67	*	0.28	4.35
巴西	*	1.88	1.64	0.07
柬埔寨	*	1.79	5.41	11.49
智利	42.38	5.67	4.03	0.19
哥伦比亚	101.31	23.10	1.88	0.45
厄瓜多尔	*	1.38	1.17	0.73
埃及	10.21	*	2.55	5.70
萨尔瓦多	72.31	6.33	1.95	2.52
埃塞俄比亚	*	1.52	1.95	10.16
危地马拉	24.60	7.74	1.43	1.39
洪都拉斯	*	2.07	2.52	6.17
印度	92.33	8.10	0.62	0.65
印度尼西亚	*	1.38	0.76	1.34
伊朗	8.76	2.86	0.52	0.08
以色列	24.95	2.10	1.74	3.48
黎巴嫩	12.69	14.52	11.58	2.47
墨西哥	*	3.26	1.79	0.06
尼加拉瓜	17.98	2.66	2.41	11.37
尼日利亚	*	2.00	2.71	0.84
巴基斯坦	61.17	7.10	0.79	2.81
秘鲁	110.57	8.79	1.92	0.91
菲律宾	40.26	8.05	1.06	1.22
南非	32.34	*	0.76	0.32
斯里兰卡	32.36	2.90	0.88	4.96
苏丹	*	1.52	2.61	4.60
泰国	22.17	1.43	2.12	0.59
土耳其	40.55	6.50	0.72	0.37
委内瑞拉	*	1.90	1.00	0.04
也门	*	1.67	1.37	3.52
平均数，122个国家	7.51	1.38	2.90	6.74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

注：表内数据为1970—2011年间每年恐怖事件的平均发生次数，外国直接投资的平均水平及外国援助的平均额。星号表示恐怖事件数目低于122个样本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发生次数。由于一些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或数据缺乏，一些国家并未包括在本表内。外国直接投资指的是外国实体控制一家企业，而非仅享受证券投资组合的利息。援助包括多边和双边援助。



援助及外国直接投资减少间存在一种令人费解的关联，而援助与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中经济体至关重要。

大家普遍认为，与受恐怖主义威胁的地区进行贸易往来会面临更高的风险，这些风险会造成交易成本上升，并往往会减少贸易活动。比如，在纽约和华盛顿特区遭遇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暂时关闭了边境，延长了禁止美国与加拿大之间进行货物运输的时间。尼特西和舒马赫(Nitsch和Schumacher, 2004年)以200个国家1960—1993年的数据为样本，对其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如果一年内有贸易往来的两个国家发生了比平时多一倍的恐怖事件，那么同一年内两国之间的贸易活动就会出现约4%的下滑。此外，他们还发现，如果两个贸易伙伴中的一个遭受至少一次恐怖袭击，那么它们之间的贸易就会下滑至遭受恐怖袭击之前的91%。布隆伯格和海斯(Blomberg和Hess, 2006年)估算，恐怖主义及其他内外部冲突会造成贸易额相当于30%关税的贸易延迟。具体而言，他们对遭受恐怖主义袭击的贸易伙伴而言，其双边贸易会下滑近4%。

相较于更富裕、更多元化的国家，小型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更易受恐怖主义的影响。

但是艾格和盖斯伯纳(Egger和Gassebner, 2015年)却发现恐怖主义对贸易的影响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么大。恐怖主义在短期内造成的影响较小，甚至根本不会造成影响；但在中期，影响较大，他们将中期界定为“袭击/事件发生的一年半内及以上”。通过总结恐怖主义对交易成本的影响，班德亚帕德耶和桑德勒(Bandyopadhyay和Sandler, 2014b)发现，恐怖主义未必会导致贸易下滑，因为资源可以重新配置。如果在两种资源(如土地和劳动力)之间，恐怖主义严重破坏了一种资源(如土地)，那么资源就会流至劳动力密集型部门。如果一国出口劳动力密集型货物(如纺织品)，恐怖主义可能会造成生产和出口增加。换言之，尽管恐怖主义会因增加交易成本而导致一种产品的贸易活动减少，那么最终的影响可能是整体贸易活动的增加或减少。这些相互矛盾的实证和理论研究结果说明未来研究会得出各种结果。

当然，恐怖主义的危害远不止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以及本文所探讨的对经济的影响。恐怖主义还影响移民和移民政策。因恐怖主义而产生的国家安全考虑可能会放大传统的劳动力全球移动所带来的好处和坏处。

比如，班德亚帕德耶和桑德勒(Bandyopadhyay和Sandler, 2014a)在其近期的一项研究中对一个发展中国

家的一个恐怖组织进行了重点分析。这项研究表明，该恐怖集团瞄准的一个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可能会对遏制跨国恐怖主义起到关键作用。针对保护措施完备的发达国家进行跨国恐怖袭击往往要求具备更多的技能：需要较成熟的恐怖分子来策划和实施这种袭击。吸引高技能人才前往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可能会增加雇佣高技能恐怖分子的难度，并进而可能遏制跨国恐怖主义。■

苏布哈予·班德亚帕德耶(Subhayu Bandyopadhyay)是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员，并兼任德国波恩国际劳动市场研究学院的研究员。托德·桑德勒(Todd Sandler)是位于达拉斯的得克萨斯大学的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Vibhooti Shukla教授。杰夫·雅那斯(Javed Younas)是阿联酋沙迦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副教授。上述作者均以个人身份参与本文的撰写，本文的观点不代表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或联邦储备系统的观点。

参考文献：

- Abadie, Alberto, and Javier Gardeazabal, 2003, "The Economic Costs of Conflict: A Case Study of the Basque Count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3, No. 1, pp. 113-32.
- , 2008, "Terrorism and the World Econom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52, No. 1, pp. 1-27.
- Bandyopadhyay, Subhayu, and Todd Sandler, 2014a, "Immigration Policy and Counterterrorism,"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110, pp. 112-23.
- , 2014b, "The Effects of Terrorism on Trade: A Factor Supply Analysi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 Vol. 96, No. 2, pp. 229-41.
- , and Javed Younas, 2014,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id, and Terrorism,"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 66, No. 1, pp. 25-50.
- Blomberg, S. Brock, and Gregory D. Hess, 2006, "How Much Does Violence Tax Trad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88, No. 4, pp. 599-612.
- , and Athanasios Orphanides, 2004, "The Ma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errorism,"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51, No. 5, pp. 1007-32.
- Egger, Peter, and Martin Gassebner, 2015,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s a Trade Impedi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 67, No. 1, pp. 42-62.
- Enders, Walter, and Todd Sandler, 1996, "Terrorism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pain and Greece," *Kyklos*, Vol. 49, No. 3, pp. 331-52.
- , 201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error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nd ed.).
- Gaibullov, Khusrav, and Todd Sandler, 2009, "The Impact of Terrorism and Conflicts on Growth in Asia," *Economics and Politics*, Vol. 21, No. 3, pp. 359-83.
- Nitsch, Volker, and Dieter Schumacher, 2004, "Terrorism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20, No. 2, pp. 423-33.

未被打破的枷锁

尽管奴隶制在几乎所有地方都被法律所禁止，但其依旧在全球经济的阴暗处存在着

马尔贾·罗塔南、吉安路卡·斯波西多、佩蒂亚·奈斯特罗瓦

多年以来，安娜一直无法在其家乡找到工作。一个表面上看上去很和善的人为她提供了一份在国外一家蘑菇农场的工作。安娜只需要借一些钱、支付一点费用，再把护照交上去就大功告成了。那个人会为她安排其余事情。安娜就这样离开了亲朋好友，但却发现自己所工作的农场条件十分恶劣。她不但精神上受到恐吓，在肉体上也遭受虐待。她的雇主扣发她的工资，说她欠他钱。

一天，警方突袭了农场。警察逮捕了所有工人并以持有虚假护照和没有工作许可证为由将其拘留。警方发现安娜是被贩运过来的，就给她提供了一个选择：提出控诉或者去坐牢。人贩子威胁安娜：如果她提出控诉，就会伤害其远在故乡的家人。安娜没钱聘请律师，而人贩子的律师则声称安娜在说谎并违反了法律。法官无法找到足够的证据来起诉人贩子。安娜被告知她必须离开这个国家。但是，由于安娜无法偿还自己为出国所筹借的钱，她只好非法居住在该国并找到了一份家政工人的工作。她的新雇主也对她进行了剥削，但她不敢去报警。安娜陷入困境之中……

以上是安娜的真实故事，是从非政府组织拉斯特国际 (La Strada International) 的网站转载的。安娜的故事中本应出现一些转机，但却没有出现；而令人心痛

的是，安娜的情况并不罕见。安娜的故事中充满了威胁和暴力、欺骗与剥削、身份识别困境以及再次受到伤害。这是人口贩运问题，是 21 世纪的奴隶制形式。在全球各



地存在着数百万人口贩运的受害者，他们被贩运是出于性奴役、劳役等原因，而安娜只是其中的一员。因为人口贩运本质上是一种地下犯罪行为，所以数据不易收集，因而官方公布的已被确认的受害者数据很可能仅仅是冰山一角。

人口贩运的受害者人数还在不断增长。2012年，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受到强制劳役和性虐待的受害者人数达到2090万。近期，自由行走基金会在其2014年全球奴役指数中公布了其针对现代奴隶制受害者的最新估计数据，该数据已高达3580万人。

人口贩运所产生的非法收益也在增加，使其成为盈利最高的犯罪行为之一。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强制劳役的非法利润已达到每年1500亿美元（2014年数据）。亚洲和亚洲以外的发达经济体的利润额是最高的，分别达到518亿美元和469亿美元。

经济学的供求法则驱动着人贩子的非法行径。尽管并不存在确定的规律，但一般而言，受害者被送往的目的地往往是低成本或无成本劳役或性剥削需求较高的地方。受害者通常由于上当受骗或者被许诺提供更好的生活而被诱骗进入人口贩运团伙。因此，他们通常来自经济条件较差且失业率较高的国家。

打击人口贩运不但从道义上讲势在必行，同时也存在着经济方面的需求。打击人口贩运是一种道义使命，这是因为贩卖人口的人将受害者作为一种可任意处置的商品，并以最恶劣的形式侵犯其人权。存在经济需求是由于人口贩运的受害者被迫日以继夜地劳作，而仅获得非常微薄的收入，甚至根本没有收入，这影响了公平竞争。人口贩运所产生的巨额非法收益通常会在合法的经济活动中披着合法的外衣进行洗钱和整合，这会潜在地对金融和经济稳定性产生威胁。

帮助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预防和打击人口贩运并发现和保护受害者存在着众多挑战，其中包括：

- 受害者对现有求助渠道和保障措施缺乏了解；受害者对公共机构心存恐惧或缺乏信任，这影响他们积极对外联络并寻求帮助；
- 政府当局难以对偷渡者和人口贩运的受害者进行区分：前者同意偷渡，他们的目的地为另外一个国家；而后者从未认可或其认可由于受到虚假承诺和虚假信息的影响而毫无意义；
- 起诉方面的挑战——例如，在收集证据并确保有效的国际合作方面存在困难。

人口贩运可以在一国境内进行，但跨越国境也是此类犯罪的一个显著特征。因此，国际合作对于预防人口贩运和将贩运者绳之以法而言至关重要。2010年，联合

国率先采取措施，通过了《防止、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议定书》（也称为《巴勒莫议定书》）。目前，全球有166个国家受到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制约。

《巴勒莫议定书》中对人口贩运做出了定义，该定义是首个在全球范围内经过认可的。该议定书旨在为各国的国内犯罪行为提供一个统一的方法，以便为在调查和起诉此类犯罪行为时实现高效的国际合作提供支持。该议定书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保护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并为其提供帮助。《联合国打击人口贩运全球计划》对议定书提供支持，并设立了信托基金用以帮助和支持受害者。

受害者通常来自经济条件较差、而且失业率较高的国家。

据估计（2014年全球奴役指数），欧洲委员会的成员国中有将近200万人生活在现代奴隶制中，以保护和促进人权、民主和法制为首要使命的欧洲委员会无法对如此严重的人权侵犯行为坐视不管。欧洲委员会于2005年通过了其《打击人口贩运行动公约》，43个欧洲国家接受该公约的制约。

尽管欧洲委员会制定的该公约建立在巴勒莫议定书（以及某些生效的国内法律）的基础之上，该公约在许多方面走得更远。该公约重点关注对人口贩运受害者提供的保障和帮助（例如，提供生存所需物品、给予紧急医疗救治并为其子女提供教育条件）并保障其权利（通过口译和笔译服务、咨询和法律建议等形式提供帮助），以及预防人口贩运和惩治贩运者。非欧洲国家也可以签约加入该公约，如白俄罗斯就加入了该公约。

欧洲委员会制定的打击人口贩运公约的部分条款影响十分广泛，目前已经在促使欧洲和全球范围内的一些国家制定国家政策和法律。该公约适用于各种形式的人口贩运——既包括一个国家内部的，也包括跨国的贩运行为；既包括有组织犯罪，也包括一般性的犯罪。不论受害者是妇女、男性还是儿童，也不论剥削采取何种方式，不论受害者是遭受性剥削还是被强制进行劳动或提供服务，该公约均适用。

该公约强制要求各国为受害者实施帮助和保障措施。该公约要求各国提供30天以上的恢复和反思期。在此期间，在一国非法居住或仅持有短期居住许可证的受害者不可以被驱逐出境。这一保障措施使受害者能够从贩运者的影响之中恢复过来，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与政府当局合作方面做出明智决策。

为了打击人口贩运并减少需求，该公约认定那些使



用受害者提供服务的行为为非法行为。这是建立在其他预防措施的基础之上的，如提高相关意识并加强教育。各国还必须确保受害者不因其被迫采取的非法行为而受到惩罚。最后，该公约保护受害者的受偿权，赔偿可由犯罪者或相关政府提供。

欧洲委员会公约创立了一个独立的监督机制（打击人口贩运行动专家组，GRETA），该机制可定期对接受公约约束的各国进行评估，以确保符合其各项规定。通过推动实施法律性或制度性变革以及制定更加具有综合性的打击人口贩运政策，GRETA 已经改善了数百万受害者的状况。

其他国际组织在打击人口贩运方面也表现积极。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于 2003 年通过了打击人口贩运行动计划。该计划在 2013 年又进行了进一步扩展，提供了一些措施，以帮助各国兑现其打击人口贩运的承诺，此外还制定了一个跟踪机制，藉此来促进 OSCE 各成员国之间以及与其他国际组织之间的协调。与上述谈到的协议一样，该计划采取了一种多维度的方式来打击和预防人口贩运、保护受害者、防止人口贩运并起诉那些从事人口贩运或者助纣为虐的人。

在区域层面上，欧盟于 2011 年发布了一项有关预防和打击人口贩运和保护受害者的指令。该指令旨在对人口贩运罪行和相关惩罚进行统一。该指令针对对受害者的保护、援助和支持做出了规定，同时对预防人口贩运犯罪和更好地监督和评估欧盟在此领域做出的努力进行了规定。

在拉丁美洲，估计有 100 万人口生活在现代奴隶制度之下（2014 年全球奴役指数）——美洲国家组织于 2014 年 12 月通过了一项关于打击人口贩运的新的工作计划。该计划旨在促进《巴勒莫议定书》的全面实施；促进机构间合作以及其成员国之间及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双边协调、区域协调以及国际协调；改善处理人口贩运的政府机构的工作。该计划试图降低对人口贩运的脆弱性；对从事打击人口贩运的专业人员、机构和组织进行培训；分发有关如何抗击这一问题的报告；以及动员社会力量来预防人口贩运并提高对其风险和影响的认识。

合作抗击虐待

法律能够为受害者主张正义。不过，抗击人口贩运的责任也需要广泛的社会力量来承担。打击人口贩运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公共部门（如执法部门）与民间团体和私人组织进行合作。行业和贸易部门应该确保其销售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不是剥削所得。旅游部门应该保持警觉，以防被用于人口贩运，因为被贩运的受害者有时是通过伪装成游客被带入其他国家的。

旅游部门通过参与公共部门的相关工作来提高这方面的意识，也可以发挥重要的预防作用。此外，媒体可以培育公众对人口贩运的认知，并通过公共舆论施加影响来抑制需求。在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合作是任何成功抗击人口贩运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显然，国际社会认同针对人口贩运需要采取多学科、多维度的方法。该方法大体上包括预防和援助措施以及起诉和国际合作。不过，虽然通过条约（以及批准条约），发布行动计划，并通过区域和国内立法都是良好的举措，但这些措施必须得以有效实施才能为人口贩运受害者的生活带来改变。进行全方位的检查并遵守法律条款并不能根除奴隶制的这种现代形式。为受害者提供援助和保障、第一线人员对减轻受害者痛苦和恐惧的持续承诺、对贩卖人口者积极起诉以及欧洲委员会公约构想的有效监控均有助于确保遵从。

打击人口贩运不但从道义上讲势在必行，同时也存在着经济方面的需求。

各国下一步要做的是评估其对人口贩运的响应效率。所有相关机构在国家层面上的合作是否真的实现？有多少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在进入警察局的时候能够被认定为受害者，而不会与非法移民混为一谈？对人口贩运案件进行调查的力度如何，在什么情况下开展此类调查？人口贩运者是否被起诉和定罪，其资产是否被查没？受害者是否受到补偿，补偿金额为多少？针对被定罪为人口贩运的自然人和法人的制裁是否生效、量刑是否适当、是否具有劝诫作用？受害者是否受到保护，以防止遭受可能的打击或恐吓，尤其是在对犯罪者进行调查和起诉期间及以后？各国在人口贩运案件中是否提供了具有建设性的和及时的国际合作，合作的成效如何？

针对上述和其他问题的答案可能会为国内和国际标准在实践中是否切实有效提供一次现实检查——以防止像安娜一样的人被卷入人口贩运的漩涡，同时将所有贩卖人口者绳之以法。■

马尔贾·罗塔南（Marja Ruotanen）是欧洲委员会人格尊严和平等理事会的主任，吉安路卡·斯波西多（Gianluca Esposito）是该理事会的部门主管，佩蒂亚·奈斯特罗瓦（Petya Nestorova）是欧洲委员会打击人口贩运行动公约的执行秘书。



纸币创建者

南非最新的货币设计向国家多元化致敬

西蒙·威尔逊

有多种官方语言的国家通常使用公共标志来肯定其母语的地位和用途。因此，路标、官方出版物、国家格言或盾徽、邮票、客机标记以及其他重要平台成为显示和熟悉两三种官方语言的工具。

尝试一下 11 种官方语言。

这是 1994 年自称“彩虹国度”的新民主南非成功结束 50 年种族隔离状态时所面临的任務。这个新国家的众多特征之一就是官方语言数量迅速增加。为了培养全国各族人民包容性国家的新观念，新南非的官方语言从 1994 年之前盛行的两种变成 11 种。

该国的官方语言除了 1994 年之前的英语和南非荷兰语，之后还通过民主投票增加了恩德贝勒语、北索托语、索托语、斯威士语、聪加语、茨瓦纳语、文达语、科萨语和祖鲁语。

在为 11 种官方语言寻找公共平台时，国家建立者可以放弃两三种母语情况下常用的备用平台。但是有一个显示媒介仍然是唯一胜任向多元化民族推广 11 种语言的工具：几乎所有公民在日常生活中都用得到，并容易通过颜色和设计识别，非常便携且易于存储，同时也是身份的象征——这不是邮票（邮票已逐渐停止使用），而是钞票。

四个功能

据钞票发行者南非储备银行所述，2012 年 11 月正式重新发行了最新五种面值的主要纸币，这些纸币有四大功能。

- 纪念 2013 年去世的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五种





面值的纸币正面都有曼德拉头像，进一步正式承认曼德拉是新南非的国父；

- 升级本币防伪特征:全世界的中央银行必须采用更先进的防伪技术，以防货币伪造者使用日益先进的扫描仪和打印机伪造货币。

- 推广“五大兽”——犀牛、大象、狮子、野牛和猎豹——这个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意识正在加强，野生动物园是其一旅游景观；以及

- 展示国家的 11 种官方语言，促进曾鼓励独立发展的种族的包容性和凝聚力。

最新发行的纸币的另一个新颖特征就是使用网站和社交媒体来加深对新版纸币的熟悉程度和接受程度。南非是一个新兴经济体，城市化速度较快，但也存在在监管和纳税贸易及就业的正式结构之外运营的非正式部门。因此，突然改变货币设计这一信息可能不容易深入到非正式部门。

现金经济

因为非正式部门大都没有银行账户，交易主要以现金为基础，所以广泛认可和接受硬币和纸币对非正式部门的有效运行非常关键。因此，储备银行宣布将通过全国巡回路演同步推出新版纸币，将新版纸币样本带到“全国九个省份城乡的零售商场、交通枢纽和养老金支付点”。

我们希望通过这项宣传活动，以深入南非的各个角落。储备银行的职责是保护南非货币的可信度。只有通过确保公众充分了解货币及其显著特征，才能履行这项职责。

——赫伦加尼·马特布拉 (Hlengani Mathebula)
南非储备银行集团策略和公关部负责人

网络和社交媒体宣传活动详细介绍了新版纸币的外观，同时还邀请新用户进行亲身体验：“鼓励公众继续用眼睛看，用手摸和翻转纸币，来检查各种防伪特征，”央行网站如是说。

两两排列

11 种官方语言分布在五种面值的新版纸币上，英语在正面突出位置，其他官方语言两两排列在各种面额纸币的背面。

各种传播平台都发布了新版纸币的信息，包括广播、电视、广告牌、横幅、储备银行网站以及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同时也包括社交媒体和移动设备网站。■

西蒙·威尔逊 (Simon Willson) 是《金融与发展》的高级编辑。



走向非洲大陆

亚历山德拉·博恩、保罗·马修

多家非洲银行集团正在该区域扩展业务，给传统银行和监管机构带来了挑战

非洲各家银行过去主要侧重国内市场，目前开始在整个非洲大陆扩张，在许多国家的银行部门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些所谓的泛非洲银行正在建立跨境网络，并且正在反超传统上主导非洲大陆银行业的欧美银行。新的泛非洲银行正在推动非洲金融服务扩张和经济一体化，有助于释放这个快速增长地区的巨大潜力。

泛非洲银行主要起源于非洲的大规模经济体（如南非、尼日利亚和摩洛哥）以及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国家（如肯尼亚）。但其中一家主要的泛非洲机构是西非银行

(Ecobank)，总部位于多哥这个小国家。西非银行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15个国家组成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背景下成立，虽然其在资产方面不是最大的泛非洲银行，但在业务覆盖的地理范围方面却无人能及。

当全球性银行已经将其业务从规模较小、风险较高的类型转移开来时，非洲多家银行的扩张对非洲金融部门发展来说是个好兆头。这些区域性机构不仅填补了全球性银行撤离所留下的空缺，也促进了金融发展和经济一体化。然而，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避免增加系统性风险以及其他区域经历的金融不稳定，这些具有重要跨境网络的银行扩张绝对离不开加强监管和强化跨境合作。

起飞

多年来，南非标准银行(South Africa's Standard Bank)一直积极开展跨境业务。但在21世纪的头几年，其他银行开始热衷于发展区域业务。2006—2010年，子公司的数量几乎翻了一倍(见图1)，从48家增加到88家，这是因为摩洛哥的多家银行和尼日利亚非洲联合银行的跨境扩张获得动力。这种快速的跨境扩张受助于政治和宏观经济稳定性的提高、强劲的经济增长以及以下具体因素：

- 20世纪90年代中期，种族隔离制度结束，给总部设在南非的银行打开了向国外扩张专业知识的大门；



南非约翰内斯堡，一家银行分行的员工正在清点钞票。

• 非洲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加强——特别是位于南非和肯尼亚境内的银行跟着客户走向国外；

• 位于摩洛哥境内的银行决定到南部地区发展业务，因为国内和欧洲的机会越来越少——包括通过购买欧洲削减开支的银行的当地业务；

• 继 21 世纪头几年的银行业危机之后，尼日利亚大幅提高了最低资本要求，这激发银行考虑通过海外扩张来利用新增的资本基础；以及

• 长期以来，西非银行成为非洲一流泛非洲银行的社会抱负，这个抱负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银行成立之时。

泛非洲银行出现了两个基本业务结构（见图 2）。一个是从国内大本营扩张的传统模式；另一个是旨在从一开始就实现多元化的网络结构。

传统模式银行从大本营扩张，大本营在这一组别的活动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跨境子公司的资产所占比重不到 20%，单个子公司的比重更低。这一组别包括南非和摩洛哥的多家银行以及少部分尼日利亚的银行。

泛非洲银行输出了创新商业模式。

第二组别的银行没有占主导地位的国内大本营，网络是最重要的。虽然银行控股公司对子公司进行集中管理，但是位于名义母国的银行子公司只是众多子公司中的一家，最大的子公司可能分布在不同国家。西非银行采用的便是这种结构，其总部位于多哥，但是其最大的子公司位于尼日利亚；还有非洲银行——在马里成立，总部最初也在马里，而控股公司后来搬到卢森堡，最终被摩洛哥海外商业银行收购。还有很多银行的结构介于这两种模式之间。此外，随着跨境业务的增长，这一组别大本营的主导地位也在下降。

服务于未得到充分金融服务的人群

东道国和母国的经济大大受益于跨境银行业务。泛非洲银行的崛起加剧了竞争，提高了效率，推出了产品创新和越来越多的现代管理和信息系统，也给东道国银行部门带来了尖端技术和专业知识。多家泛非洲银行向东道国输出了创新商业模式和传输通道，如肯尼亚机构的移动银行业务。这些进步有助于银行提供更多服务和产品（通常称为金融深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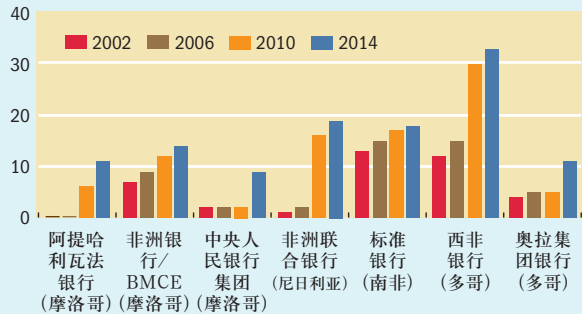
泛非洲银行也向难以获得银行服务的人群，即所谓的未得到充分金融服务人群，提供银行服务。例如，当多家肯尼亚银行开始在东非共同体其他成员国开展业务

图1

迅速扩张

过去十年，大型泛非洲银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业务已经翻了不只一倍。

（外国子公司数量）



资料来源：银行网站和年报。

注：BMCE=外贸银行。

的时候，它们利用自己在代理和移动银行业务领域的专业知识来服务于未得到充分金融服务的人口。同样，多家摩洛哥银行扩大了西非法语区的小额信贷业务，与此同时，其子公司侧重于向中小型企业放贷。多家尼日利亚银行一直在增加西非分支机构数量，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泛非洲银行现象也有助于东道国提高财务标准。来自较发达经济体银行的子公司使用要求更高的母国标准，东道国监管机构接触更为复杂的报告监管实践，如巴塞尔委员会（一家国际银行监管机构）推荐的资本标准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颁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东道国监管机构与母国监管机构联合对外国子公司进行现场监管并参加监管联席会，从中获益，从而巩固了这种相互学习效果，监管联席会汇集了各个独立银行集团的监管机构。

泛非洲银行的扩张也有利于母国银行，因为它们增加了多样性和发展机会。

管理系统性风险

泛非洲银行的崛起给监管和监督机构带来了新的问题。随着网络的扩大，母国和东道国出现了宏观金融风险以及其他溢出效应的新传播渠道。例如，总行层面的问题，如认识到管理不善或声誉风险，可能会导致子公司出现银行挤兑。同样，如果子公司的业务相对比集团其他子公司大，那么东道国的经济问题或金融问题可能会影响到总行。由于泛非洲银行的业务范围和复杂性增加，已经出现了监管差距。母国监管机构如果没有把握银行集团整体的结构和运营，就难以确定子公司运营的稳健性和面临的潜在风险。这就要求母国监管机构与东道国监管机构合作，牵头为整个集团制定一个统一的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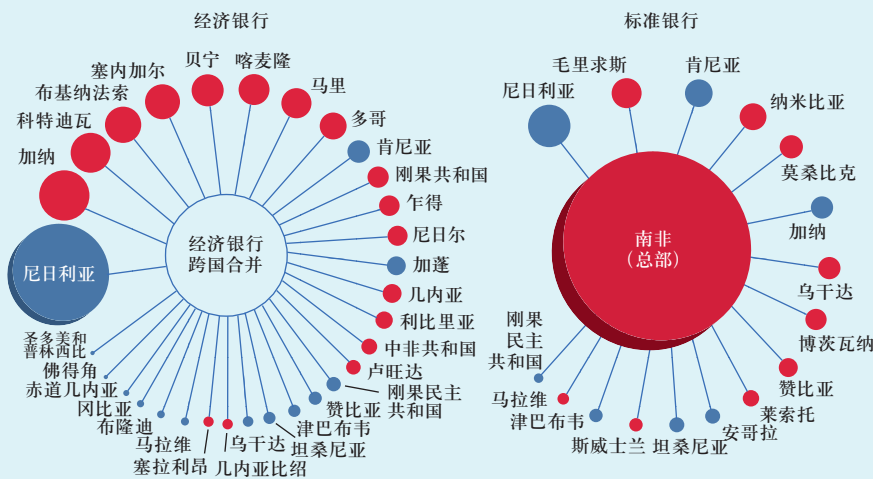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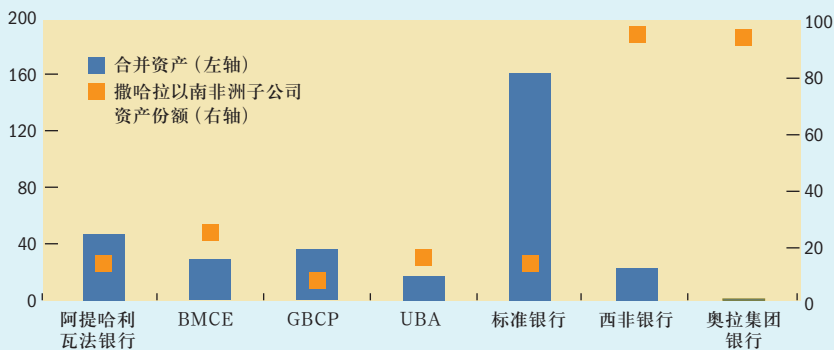
图2

随你挑选

两个基本商业模式在泛非洲银行业占主导地位。一个模式的特征是大型机构从大本营扩张到外国，如标准银行。另一个模式是从跨国网络开始发展，如西非银行。

(合并资产, 10亿美元)

(撒哈拉以南非洲子公司占总资产份额, 百分比)



资料来源: 银行年报; Bankscope数据库; 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 圆圈大小代表银行集团各子公司的资产占总资产的份额。红圈表示子公司拥有超过10%的银行系统存款总额。BMCE=外贸银行, GBCP=中央人民银行集团; UBA=非洲联合银行。

管方法。依靠关于监督信息系统交换谅解备忘录、针对银行集团的监管联席会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要。泛非洲银行的扩张产生了一个系统性重要银行网络(见图3)——即破产可能引起广泛金融后果的机构——这个网络强化了非洲母国强有力的监管领导的必要性。

非洲大部分地区的监管能力已经受到限制并且欠缺资源, 跨境银行给母国监管机构带来了额外压力, 要确保这些集团受到充分监督。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清楚地表明, 跨境监管合作和解决对于应对金融稳定风险至关重要, 跨境合作不足会造成严重后果。如果在跨境银行问题解决方面缺乏有效的合作和规划, 用于解决跨境机构问题的工具往往是紧急关头采取的临时干预措施, 这些干预措施需要获得公众支持。即使监管机构之间长期存在的关系在危机中也会破裂。

母国和东道国的机构和经济规模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这加剧了两国监管机构利益不统一, 从而严重阻碍了跨境合作。一些泛非洲银行子公司在东道国具有系统重要性, 但是可能只占银行集团整体业务的一小部分。如果母国主管机构或总行采取单边行动——例如, 限制母国机构调整外国子公司资本(即隔离), 这可能影响东道国管辖区的金融稳定。在其他方面都一样的情况下, 母国和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差异越大, 金融机构的总体战略就越不可能特别考虑东道国的需求, 如果母国出现问题, 给东道国带来的金融稳定威胁也会越大。例如, 在欧洲多家西欧银行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削减给东欧国家贷款——西欧相对较小的举动给东欧带来了严重影响。2009年和2011年的维也纳倡议是对加强密切合作来维护金融稳定做出的回应, 考虑了欧洲新兴的系统性风险问题。

谋取跨境银行业务利益

为确保非洲跨境银行网络的收益可持续, 泛非洲银行的形成必须包括基于增强的跨境合作和优化的统一监管。国际最佳实践呼吁整体看待自主运营和银行集团面临的风险, 这通常需要建立各个监管联席会并长期交换监管机构和监督机构之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概述的信息。必须在平时而不是等危机发生了才建立这一合作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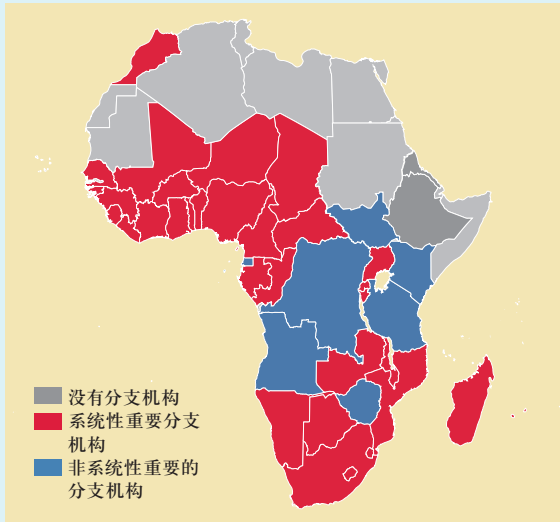
泛非洲银行扩张使非洲各国易受金融问题溢出效应的影响, 同时增加了这种溢出效应的强度。若不了解如何解决受困银行的问题, 监督本身的效力可能有限。各个监管机构可能会在危机时期采取“隔离”方法, 但却达不到最佳结果。全球金融危机表明, 缺乏可行的跨境运作框架的代价很大——也让人们理解构建这些框架的难度有多大。

非洲必须把监管和会计准则升级到国际标准, 以

图3

占主导地位的银行

大型泛非洲银行在约80%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有系统性重要分支机构。



资料来源：银行年报；Bankscope数据库；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如果母国母行或东道国子公司拥有超过10%的银行系统存款，就是系统性重要分支机构。这些银行有阿提哈利瓦法银行、外贸银行、西非银行、中央人民银行集团、奥拉集团银行、标准银行和非洲联合银行。

便提高透明度，促进一体化。在推行这些改革中，IMF等国际机构可以在提供广泛技术支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亚历山德拉·博恩（Alexandra Born）是IMF货币与资本市场部的经济学家；保罗·马修（Paul Mathieu）是该部的顾问。

本文基于“Pan African Bank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Cross-Border Oversight”，2015年，由来自IMF非洲部、中东和中亚部以及货币和资本市场部工作人员组成的小组撰写，该小组由Charles Enoch、Paul Mathieu和Mauro Mecagni领导。

沉闷的科学？

IMF



在播客上聆听我们对顶级经济学专家的采访并作出决定：

www.imf.org/podcasts



富人与 大衰退

侧重于使用中产阶级行为来解释美国的繁荣与萧条可能太过于狭隘

巴斯·巴克、约书亚·费尔曼

关于2007年始于美国的大衰退的传统叙述侧重于房价起伏以及对中产阶级消费的影响，中产阶级的大部分财富都集中在住房上。

富人受到的影响微乎其微（如果有的话），其部分表现在消费的增加和减少方面。小康家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只是作为“过度储蓄”的制造者（Kumhof、Rancière和Winant，2013年）。根据这个解释，20世纪80年代开始，富人的收入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使得他们把增加的储蓄借给面临困境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使用这些资金来维持消费增长，炒房地产（Rajan，2010年）。

起初还一切顺利，因为房地产繁荣推动了建筑等相关行业的发展。但是，到了2007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中产阶级开支紧张，不再买房，导致房价暴跌，以至于很多业主突然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也就是说，房贷比他们的房产价值还高。有的人违约了。其他人迅速增加储蓄率，这样做可以偿还债务（Mian和Sufi，2014年），从而抑制了消费。结果导致了深度衰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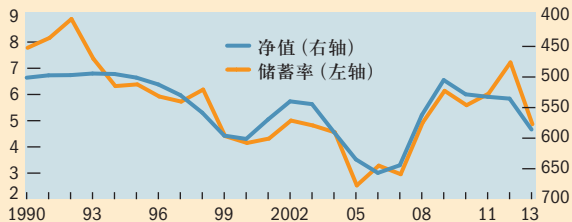
但是，这个传统叙述并不完整。导致大衰退幅度如此巨大的不只有房产财富的下降，还有金融财富的缩水。不仅如此，富人不只是被动的观众，而且也是消费周期的

图1

储蓄波动

储蓄率反映了家庭净值变化。美国储蓄率随着净值的上升而下降。

（储蓄率，可支配收入百分比） （家庭净值，可支配收入百分比）



资料来源：Bakker和Felman（201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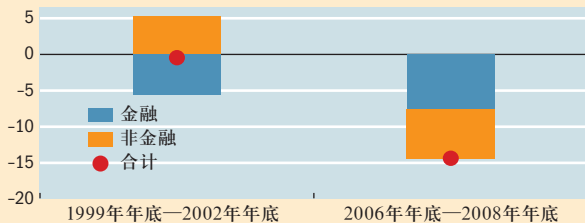
注：右轴数值次序翻转显示家庭净值增长，储蓄率下降，反之亦然。可支配收入是家庭可用于支出或储蓄的税后资金。

图2

不同的场景

互联网泡沫破灭期间，非金融资产增加抵消了美国金融资产的下降，主要是房产。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这两种资产都出现暴跌。

(资产变化, 万亿美元)



资料来源: Bakker和Felman (2014年)。

积极参与者。事实上，考虑到持有的资产规模，富人的支出波动很可能是繁荣和随后的萧条的主要原因 (Bakker 和 Felman, 2014 年)。

财富效应在家庭储蓄率在危机前下降和在危机后激增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见图 1)。经济繁荣时期资产价格飙升，让人们觉得自己变得有钱了，于是增加消费和降低储蓄率。当危机期间资产价格暴跌时，财富效应发生逆转，导致消费下降 (Case, Quigley 和 Shiller, 201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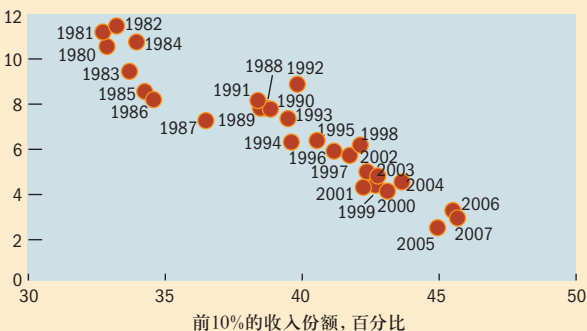
米安和苏非 (Mian 和 Sufi, 2014 年) 认为，房价波动尤为重要，因为购买房地产和购买金融资产不一样，其主要是通过借贷而购买。因此，房价下降导致财务困难，迫使家庭相应缩减开支。他们认为，这种动态解释了大衰退比所谓的互联网泡沫破灭 (继互联网公司推动的三年繁荣之后，2000 年股价暴跌) 更严重的原因，即使股票财富亏损也跟这个十年后的房产财富亏损一样惨重。

图3

富裕的消费者

大衰退出现之前，储蓄率在30年里随着收入分配转向富人而下降。

(储蓄率, 可支配收入百分比)



资料来源: Bakker和Felman (201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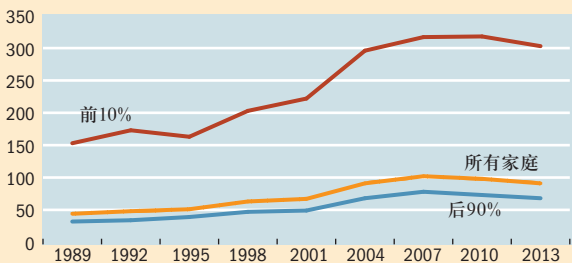
注: 可支配收入是家庭可用于支出或储蓄的税后资金。

图4

富裕的债务人、贫穷的债务人

在全球危机发生之前的几年里，富裕的美国家庭债务的增速与中产阶级一样。

(平均家庭债务, 千美元)



资料来源: Bakker和Felman (2014年)。

但解释可能更简单。非金融资产 (主要是房产) 的增加缓解了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影响，而金融资产的下降加剧了住房市场的崩溃 (见图 2)。事实上，金融资产在财富 13 万亿美元的峰谷损失中占了 8 万亿美元。换句话说，大萧条期间消费削减远大于互联网泡沫破灭期间的原因之一就是整体财富损失更大。

富人的储蓄率

为什么在危机前家庭总储蓄率在下降，而收入分配转向储蓄可能更高的富人？标准解释是，中产阶级储蓄减少远大于富人的储蓄增加。虽然缺乏各收入阶层储蓄的综合数据，但这个标准解释还是令人难以置信。

如果富人在危机前一直大量储蓄，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什么过去 30 年里收入分配和储蓄一直呈很强的负相关性：富人的收入份额越大，整体储蓄率越低 (见图 3)。此外，在危机前夕，富人的债务增速实际上与中产阶级一样快 (见图 4)。这些证据表明，富人的储蓄率肯定一直在下降。

但是为什么富人在收入快速增长时也减少了储蓄率？他们在对财富激增做出反应。前 10% 收入者的财富收入比从 1994 年的 721% 增长到 2007 年的 912%。相比之下，后 90% 收入者的财富收入比在此期间增长缓慢，从 373% 增长到 404% (见图 5)。虽然收入增长可能鼓励富人增加储蓄，但财富增速更快的影响足以抵消储蓄的增加，这促使他们增加支出，导致整体储蓄率降低 (相对于收入)。

如果富人的储蓄率与中产阶级的储蓄率遵循相同的周期，那么他们在推动消费增加与减少方面肯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毕竟在此期间富人的收入和财富增长占据了整体收入和财富增长的大部分 (见图 6)。

为了在实践中证明这一点，我们估算了一个消费模型，这个模型将家庭消费与 (1) 前 10% 的收入、(2) 后 90% 的收入以及 (3) 家庭总财富挂钩。估算结果表明，每增

加1美元收入，中产阶级就会消费95美分，而富人只消费65美分。这表明，富人的结余更多。但是富人的财富也更多。我们的估算表明，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是2.2%，这意味着财富每增加1美元，消费将增加2.2美分。这个比例似乎不高，但是因为前10%的财富数额非常高（50万亿美元），所以其对消费的影响也相当大。

接下来，我们使用该模型来计算富人在推动消费方面发挥的作用。我们预计富人的作用很大，原因很简单——他们的收入增长和财富增长远大于中产阶级。

2006年到2009年间，消费放缓主要是因为富人消费下降。

通过该模型得出的结果确实惊人。前10%收入者的消费增长占据了整体消费增长的大部分。2003年到2013

年间，约71%的消费增加来自于富人。2006年到2009年间，消费放缓主要是因为富人消费下降。而且富人在随后的经济复苏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他们的财富回升有助于消费复苏（尽管回升幅度较小，因为收入增长以及财富收入比仍然低于危机前水平）。

多个作用因素

我们的结果不是决定性的，因为缺乏富人消费行为的确切数据（就此而言，也缺乏中产阶级的数据）。不过可用证据表明，对大衰退的典型叙述需要调整。住房发挥了一定作用，但金融资产也发挥了作用，实际上财富损失的大部分为金融资产。中产阶级发挥了作用，富人也发挥了作用。事实上，富人可能在繁荣和萧条期间影响了大部分总消费波动。这些发现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对未来展望也有重要启示。目前，富人的收入占比如此之大（而且他们的财富也很多），未来他们的资产波动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巴斯·巴克（Bas Bakker）是IMF欧洲部顾问，约书亚·费尔曼（Joshua Felman）是IMF研究部副主任。

参考文献：

Bakker, Bas B., and Joshua Felman, 2014, "The Rich and the Great Recession," IMF Working Paper 14/225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Case, Karl E., John M. Quigley, and Robert Shiller, 2011, "Wealth Effects Revisited, 1978–2009," Cowles Foundation Discussion Paper No. 1884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Kumhof, Michael, Romain Rancière, and Pablo Winant, 2013, "Inequality, Leverage and Crises: The Case of Endogenous Default," IMF Working Paper 13/249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Mian, Atif, and Amir Sufi, 2014, *House of Debt: How They (and You) Caused the Great Recession, and How We Can Prevent It from happening Aga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ajan, Raghuram, 2010, *Fault Lines: How Hidden Fractures Still Threaten the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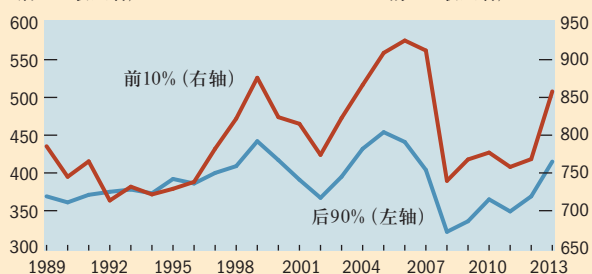
图5

财富激增

1994年到2007年间，美国前10%收入者的财富在收入中的占比急剧上升。

(百分比，可支配收入，后90%收入者)

(百分比，可支配收入，前10%收入者)



资料来源：Bakker和Felman (2014年)。

注：可支配收入是家庭可用于支出或储蓄的税后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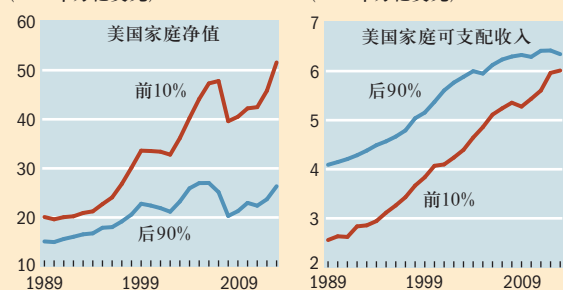
图6

富人的财富和收入

1989年到2013年间，美国富人的收入和财富增长占据整体收入和财富增长的大部分。

(2012年万亿美元)

(2012年万亿美元)



资料来源：Bakker和Felman (2014年)。

注：可支配收入是家庭可用于支出或储蓄的税后资金。

受阻的改革

约翰·基弗

场外衍生品交易——除其他因素之外，与其他证券、指数、指标、大宗商品甚至其他衍生品挂钩的金融工具导致了或者至少加剧了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这是目前比较流行的版本，但是这个版本还没有被普遍接受。

但是无论场外衍生品是不是全球危机的罪魁祸首，几乎所有分析师都认为场外衍生品市场（即双方在交易所之外的场所直接进行工具交易的场所）的规模已经壮大，重要性也在增强，以至于需要将这些市场纳入公开的更严格的监管。

在2009年匹兹堡峰会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呼吁对这些市场进行大规模改革，改革计划在2012年年底完成。这些改革旨在让衍生品交易更安全、更透明（通过使相关机构和投资者评估可能会涌现的、导致更深远金融问题的压力增长情况）。

但是在截止日期之后的两年多以来，还没有哪个国家完全实现任何一项改革，而且一些国家甚至还没开始进行改革。二十国集团支持的改革包括改变大多数衍生品合约中一方（统称为交易对手）与另一方的交易方式。二十国集团希望在被称为中央清算的过程中在双方之间插入中央交易对手，而不是纯粹的双边关系。二十国集团还呼吁将大部分衍生品的场外交易转移到交易所或电子交易平台（基于互联网的金融工具交易系统）。对于不进行中央结算的合约，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建议提高银行资本要求。

许多情况下，这些改革已经被推迟了，

因为实施这些改革所需的立法流程和监管流程（包括跨境协调）比预期更复杂。一些国家畏缩不前，等待欧洲和美国制定和实施改革。本文评估了改革进程和已出现的跨境摩擦状态。

多种衍生品和风险

按衍生品价值的挂钩对象及其结构特点划分，衍生品有多种类型。从根本性质来说，衍生品是合约（如远期合约和期货合约），允许交易对手在某一时间以特定价格买卖某种资产——小麦、外汇、石

改革场外衍生品市场的举措正在进行，但是远远落后于预定计划



美国芝加哥市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交易员。

油——从而锁定未来价格或汇率的合约。但是，一些衍生品是复杂的期权合约，有多种触发因素和结果，有时触发因素和结果还相互重叠，有条件限制。

衍生品可以在经济中发挥有益作用。例如，企业和政府使用名为互换的衍生品扩大投资和借贷机会，使收入和支出更容易预测。自然资源企业和农民可以使用大宗商品远期合约锁定价格。航空公司依靠能源衍生品对冲燃油价格波动。这些类型的终端用户活动构成了近 700 万亿美元市场的大部分交易（见图）。

绝大多数衍生品在场外交易（见表），交易量使用持仓合约名义总值衡量。名义金额是基础衍生品合约的本金价值，通常只需支付少量预付款，预付款金额通常规定为名义金额的某个百分比。名义金额也反映了期货合约和远期合约需要交割的资产数量和价格。例如，远期合约要求以每加仑 3 美元的价格交割 10000 加仑航空燃油，购买价格锁定为 30000 美元，不论合约期间燃油价格会发生什么变化。对于其他类型的衍生品（如互换），名义金额就是使用利率计算分期付款义务的基础。

除了与基础本金相关的市场风险，衍生品用户还面临交易对手风险——当交易对手向未违约交易对手承担的义务金额超过了未违约方亏欠违约方的金额时，交易对手发生违约的概率。这些义务的价值随着基础利率、价格或指数变化而变化。对于交易所交易的衍生品，其价值可以直接观察到，但在场外衍生品的情况下，通常没有公开报告，必须使用数学模型估计这个价值。

此外，如果两名交易对手之间有若干个合约，未违约方必须继续履行与违约交易对手签署的其他合约所规定的义务。可以通过签署一个包括所有交易的主协议来允许在交易对方一方违约的情况下实施终止净额结算，从而降低这个风险，即两名交易对手的所有合约支付义务终止，合约的正负价值相互抵消，得出一个净结

算金额。

要求针对风险和剩余风险提供抵押品（也称保证金）（IMF，2010 年）可以进一步降低交易对手风险，每天的抵押品金额不一。保证金通常由现金或有价政府债券组成。

中央清算

衍生品合约期间的定期付款和各种风险管理活动是所谓的“清算”元素。在双边合约中，清算活动直接在两名交易对手之间发生，而在中央清算交易中，被称为中央交易对手的专门金融机构介入交易对手（称为清算会员）之间。最初的交易对手合约被与中央交易对手签署的两个新合约取代，中央交易对手与双方进行交易。

中央交易对手可以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效率。中央交易对手通过执行风险管理最佳实践（如日常合约重估和要求提供保证金）来提高安全性，加速处理清算会员违约情况。此外，中央交易对手可以实现多边净额结算（与上述双边净额结算截然不同），这可以减少交易对手系统风险敞口。如果出现违约，中央交易对手可以通过促进将亏损清算会员的头寸和保证金资金转移至有偿付能力的清算会员，从而控制市场对违约蔓延（扩散）的担忧（Gregory，201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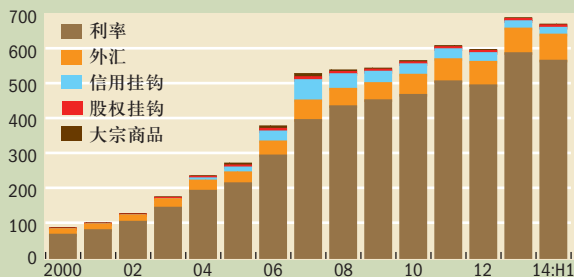
中央交易对手在扩散控制方面的作用是二十国集团呼吁对所有标准条款和条件的衍生品合约进行中央清算而不进行双边清算的主要原因。中央清算也方便向交易数据库申报衍生品交易，这个数据库收集和记录了场外衍生品交易的详细信息。（二十国集团还呼吁向交易数据库申报场外衍生品交易）。有了这些记录，监管机构和金融稳定机构可以了解交易对手违约后危险的风险敞口的增加情况以及潜在涟漪效应。强制中央清算关注标准化合约，因为中央交易对手难以对定制衍生品合约做出评估并与其他合约进行净额结算。

二十国集团还呼吁适当情况下（如有足够的交易量

大幅度增长

除了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略微放缓，过去 15 年来场外交易衍生品大幅增长。

（持仓衍生品合约，名义金额，万亿美元）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2014年）。

注：名义金额是基础衍生品合约的本金总值。场外交易是买方和卖方的双边交易。交易所交易通常发生在正式场合，通常情况下，中央清算机构介入买方和卖方。

合约品种丰富

全球衍生品市场巨大。

（持仓合约名义金额，10亿美元，2014年6月30日）

	场外	交易所交易
利率合约	563,290	65,624
外汇合约	74,782	379
信用违约互换	19,462	无
股权挂钩合约	6,941	7,460
大宗商品合约	2,206	无
未分配	24,811	无
合计	691,492	73,463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2014年）。

注：名义金额为基础衍生品合约价值总额。场外交易是买方和卖方之间的双边交易。交易所交易发生在正式场合，通常情况下，中央清算机构介入买方和卖方。未分配金额为国际清算银行对没有参与半年度调查的交易商的头寸估值。

时)，在交易所和电子交易平台交易所有具备标准条款和条件的合约。二十国集团认为，交易不透明，如双边交易，使市场更不可靠，容易增加风险，特别是在面临压力的情况下。不透明可能也增加了确定交易价值的难度，这可能会影响风险管理。另一个全球性机构——金融稳定委员会（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授予其监控改革实施）——还呼吁提高非中央清算衍生品的风险管理标准，包括设置保证金。

这些改革旨在让衍生品交易更安全、更透明。

广泛地说，改革进程发生在两个层面：

- 全球标准制定者的总体框架和原则确保全球一致实施改革，没有歧视性。

- 国家主管机构落实相应的法律法规。

全球标准制定过程即将完成，但一些剩余部分尤其棘手。例如，中央交易对手的风险管理和监管原则已经完成，但是确定哪些产品已经足够标准化、有资格进行强制中央清算的规则还在制定中。虽然大部分交易申报的全球监管原则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交易对手层面和产品层面的标准化标识符确定工作还在继续，以确保类似交易只有唯一名称。

但从国家层面看，许多方面进展滞后。美国进展最快。美国已经实施了归入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监管的衍生品的所有条例。然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的衍生品实施进程最近才开始。欧洲的进展滞后于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因为改革进程涉及 28 个成员国及其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此外，涵盖交易平台授权的法律法规也是投资服务规定全方位改革的一部分。其他一些国家也退缩不前，不是在评估各项改革对其市场的影响，就是在等待欧盟和美国完成进程。

各个国家之间的监管不一致和摩擦也导致了改革之路比预期更为坎坷。二十国集团领导人要求各国主管机构设法遵守其他国家的法规，但是欧盟监管机构不同意欧盟交易对手使用美国的中央交易对手，而美国监管机构希望涉及美国交易对手的交易在美国授权的交易平台上进行。

尽管如此，许多改革正在成功推出。超过半数的利率衍生品和存在活跃中央交易对手的约 40% 的信用衍生品进行中央清算（FSB，2014a）。现在，几乎所有场外利率衍生品和信用衍生品都向交易数据库申报。

许多方面进展缓慢

但其他方面一直进展缓慢。例如，将交易转移到电

子平台的速度比转移到中央交易对手的进度慢，部分原因是这涉及到很多新的规则。“适用情况”和“标准化”标准仍然必须在全球标准制定层面得到解决。很多国家都存在申报和信息共享的法律障碍，包括隐私和银行保密法以及数据保护机制。而且扩大交易数据库可能增加了全面了解市场及其相关关系的难度。这个困难需要呼吁加强申报标准化和建立集中数据中心，以便将 20 来个目前获得授权的交易数据库的数据汇集在一个场所（FSB，2014b）。

主管机构如果希望控制全球金融稳定风险，就不能只关注国家利益。如果想要获得类似结果，成功取决于各个国家对其他国家法规的尊重程度以及妥协，包括隐私相关法律和其他阻碍跨境信息共享的法律。■

约翰·基弗（John Kiff）是IMF货币与资本市场部金融部门高级专家。

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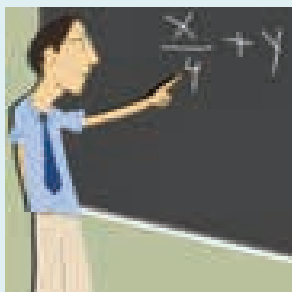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 2014, "OTC Derivatives Market Activity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4," Statistical Release (Basel).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 2014a, "OTC Derivatives Market Reforms: Eighth Progress Report on Implementation" (Basel: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 2014b, "Feasibility Study on Approaches to Aggregate OTC Derivatives Data," Consultation Paper (Basel: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Gregory, Jon, 2014, *Central Counterparties: Mandatory Central Clearing and Initial Margin Requirements for OTC Derivatives* (Hoboken, New Jersey: Wiley Financ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10, "Making Over-the-Counter Derivatives Safer: The Role of Central Counterparties,"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Chapter 3* (Washington, April).



什么是资本主义？

自由市场可能并不完美，但却可能是组织经济的最佳途径

萨尔瓦特·贾汗、艾哈迈德·萨比尔·马哈茂德

人们通常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在这个体制里，私人拥有和控制符合他们利益的财产，供需方可在市场上自由设定价格，以实现社会最大利益。

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利润的动机。正如18世纪的哲学家和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所述：“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身利益的需要。”参与自愿交换交易的双方都能从交易结果实现自己的利益，但是如果不能提供另一方需要的东西，其也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正是这种理性的利己主义促进了经济繁荣。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资产（如工厂、矿山和铁路）可以由私人拥有和控制，使用现金工资购买劳动力，资本收益属于私人业主，而且价格在有竞争性用途方面分配资本和劳动力（见“供给与需求”，《金融与发展》2010年6月号）。

虽然某些形式的资本主义在今天几乎是所有经济体的基础，但上个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资本主义只是经济组织的两种主要方法之一。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国家拥有生产资料，国有企业寻求社会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

资本主义的支柱

资本主义建立在以下支柱上：

- 财产私有，允许人们拥有土地和房屋等有形资产以及股票和债券等无形资产；
 - 利己，人们追求自身利益，不考虑社会政治压力。
- 尽管如此，这些没有经过协调的个人最终会造福社会，正如亚当·斯密在1776年《国富论》中所述，有一只看

不见的手在引导他们；

- 竞争，通过企业自由进出市场，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也就是实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共同福利；

- 市场机制，通过买方和卖方之间的互动以非集中化方式确定价格——价格反过来也可以分配资源并追求最高回报，不仅包括商品和服务，也包括工资，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 自由选择消费、生产和投资——不满意的客户可以购买别的不同产品，投资者可以选择更有利可图的风险项目，工作者可以离职去待遇更好的地方；以及

- 政府作用有限，保护普通公民权利并维持有序环境来促进市场的正常运作。

按这些支柱发挥作用的程度划分，资本主义可分为多种形式。在自由市场，也称为自由放任经济，市场在监管很少甚至没有监管的情况下运作。在混合经济中，市场和政府共同发挥作用，市场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在很大程度受到政府监管来纠正市场失灵（如污染和交通拥堵），并提高社会福利以及出于国防和公共安全等其他原因。今天，混合资本主义经济占主导地位。

资本主义的多个阴影

经济学家使用不同的标准把资本主义分为不同的组别。例如，根据生产的组织方式，资本主义可以简单地分成两种类型。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竞争性市场占主导地位，大部分生产过程以非集中化的方式发生，类似于美国和英国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协调型市场经济通过工会和商业协会等非市场机构交换秘密信息——如德国和日本（Hall 和 Soskice, 2001年）。

最近，经济学家已经根据企业家精神（创业过程）在推动创新和制度设定方面的作用，确定了四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在这种制度设定中，实施新想法来刺激经济增长（Baumol、Litan、Schramm，2007年）。

在宏观调控资本主义中，政府决定需要发展的行业。这种类型的资本主义最初是出于促进增长的动机，它存在几个缺陷：过度投资、选错赢家、容易滋生腐败以及当不再合适时难以撤回支持。寡头资本主义保护小部分人，让小部分人致富。经济增长不是核心目标，在这种类型的国家中，不平等和腐败现象严重。

大型企业资本主义利用了规模经济优势。这种类型对产品批量生产很重要。创业资本主义在汽车、电话和电脑生产方面取得突破。这些创新通常是个人和新企业的产物。然而，需要大型企业进行大规模生产和推销新产品，所以大型企业和创业资本主义的组合似乎是最佳选择。这就是美国相较其他国家最具特色的地方。

凯恩斯主义批评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遭遇人口大量失业。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6年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资本主义应努力从投资放缓中恢复过来，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可能无限期停留在高失业率和无增长的平衡中。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质疑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在没有国家干预来拉动总需求和对抗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高失业率和通货紧缩的情况下自主运作的观念。他认为需要进行政府干预（通过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来引导经济走出萧条（见“什么是凯恩斯经济学”，《金融与发展》2014年9月号）。这些行动试图缓和商业周期的繁荣与萧条，并帮助资本主义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凯恩斯从来没有打算使用其他经济来替代市场经济；他只是断言有必要进行周期性的政府干预。

通常来说，导致资本主义成功的力量也会导致资本主义失灵。只有在政府制定了管理自由市场的规则（如确保产权的法律）并通过适当的基础设施（如运送货物和人员的道路和高速公路）给市场提供支持时，自由市场才能蓬勃发展。然而，政府可能会受到有组织的私人利益影响，试图利用监管权通过牺牲公共利益来保护其经济地位——例如，通过压制使其获得成功的自由市场。

因此，拉詹和津加莱斯（Rajan和Zingales，2003年）认为，社会必须“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即采取适当措施保护自由市场不受企图阻碍自由市场有效运作的强大私人利益的影响。必须限制生产性资产的所有权集中，来确保竞争。而且，因为竞争产生赢家和

输家，失败者必须获得补偿。自由贸易和现有企业面临的强大竞争压力也牵制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公众需要看到自由市场的优点，反对政府以牺牲整体经济繁荣为代价干预市场和保护强大的现有企业。

通常来说，导致资本主义成功的力量也会导致资本主义失灵。

资本主义下的经济增长可能远远超过其他经济制度，但是不平等仍然是资本主义倍受争议的属性之一。是私人资本积累的动态必然导致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还是增长的平衡力量、竞争和技术进步会减少不平等？经济学家采取各种方法来寻找经济不平等的驱动因素。最近的研究分析了追溯到18世纪的独有数据收集，来揭开关键的经济模式和社会模式（Piketty，2014年）。这项研究发现，在当代市场经济中，投资回报率经常超过整体增长。考虑到复利，如果这种差异一直存在，资本所有者持有的财富增速将远远超过其他类型收入（如工资），最终大幅度超过这些收入。尽管各界对这项研究褒贬不一，但是此研究加剧了关于资本主义财富分配的辩论，强化了许多人认为必须由政府政策和公众来引导资本主义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从而确保亚当·斯密所指的看不见的手继续推动社会发展这一信念。■

萨尔瓦特·贾汗（Sarwat Jahan）是IMF战略、政策与检查部的经济学家，艾哈迈德·萨比尔·马哈茂德（Ahmed Saber Mahmud）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经济学项目副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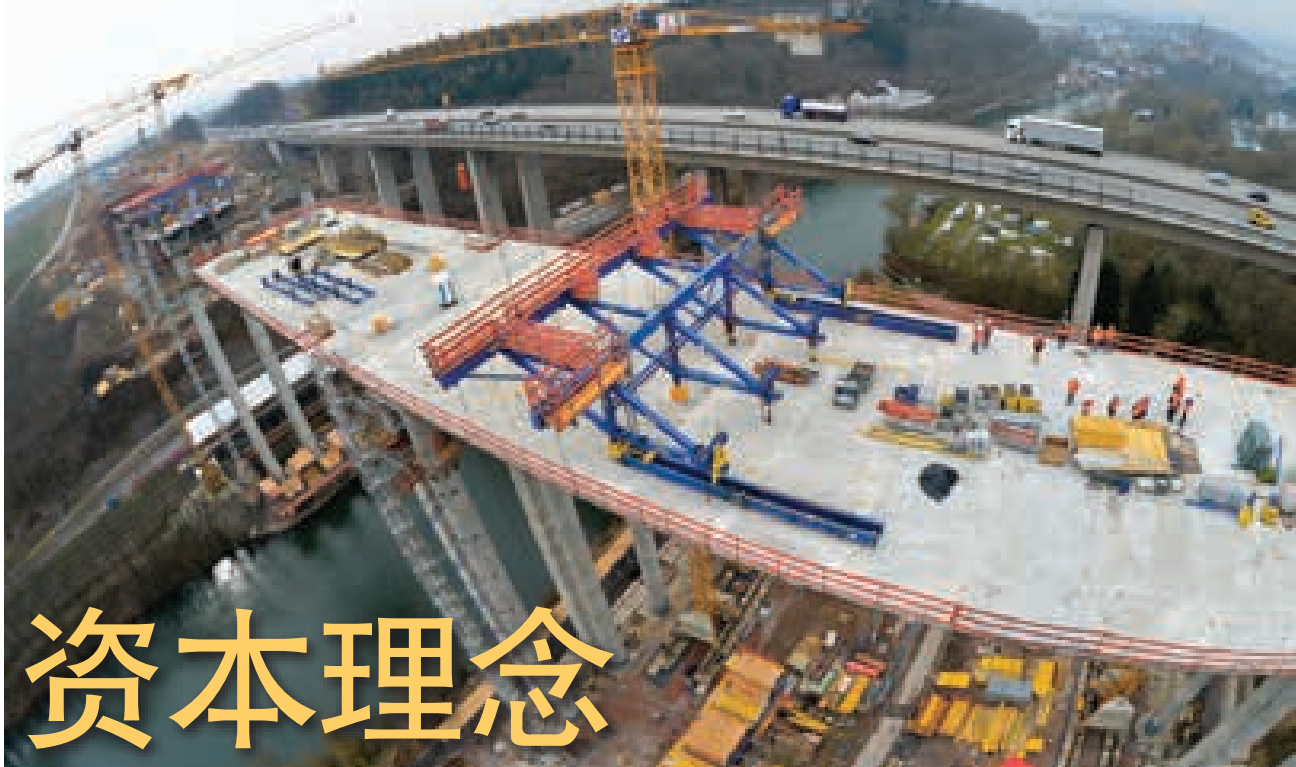
参考文献：

Baumol, William J., Robert E. Litan, and Carl J. Schramm, 2007, *Good Capitalism, Bad Capita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rowth and Prosperity*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Hall, Peter A., and David Soskice, eds., 2001,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iketty, Thomas, 2014,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elknap Press).

Rajan, Raghuram, and Luigi Zingales, 2003, *Saving Capitalism from the Capitalists: Unleashing the Power of Financial Markets to Create Wealth and Spread Opportunity* (New York: Crown Publishing Group).



资本理念

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开支，德国不仅帮助了自己，也帮助了整个欧元区

塞利姆·埃莱克达、德克·缪尔

欧元区经济复苏缓慢且不持久，即使是在欧洲最强经济体德国，近年来的增长似乎也缺乏动力。此外，对德国增长潜力的估计值较低，而且因为人口迅速老龄化，可能还会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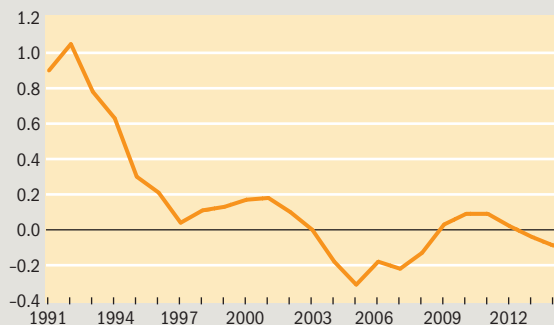
但有一种方法可以缓解德国的增长问题，甚至还可以缓解整个欧元区的增长问题。德国对公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公共投资的增加不仅会刺激其近期国内需求，而且从长远来看，也会提高生产率和国内产出，给欧元区

的其他国家带来有利的溢出效应。

虽然普遍认为德国的公共基础设施没有缺陷，但实际上公共基础设施已经被忽视一段时间了，特别是交通运输领域（如道路老化），德国已经发现这个领域的迫切需求。德国的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34个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处于后1/4的位置，事实上，自2003年以来，净公共投资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过去十年政府净投资与国内净产值的平均比率为-0.1%，这与公共资本存量恶化有关（见图1）。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可能会显著扩大德国潜在产出，即经济体可以持续产出的GDP最大值。例如，改善基础设施将便于企业使用和产出的商品进行流动。

图1
施工减少

十多年来，德国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一直在下降。
(净投资，占净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联邦统计局；《哈佛分析》。

来自德国的溢出效应

我们使用IMF的全球一体化货币财政模型（见专栏）来量化德国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带来的国内效果和对其他国家的溢出效应（Elekdag和Muir，2014年）。我们对模型的调整有四大特点：

- 优化消费和储蓄的家庭，考虑到他们的规划周期；
- 基础设施生产性国家债券；
- 货币政策的明确作用；
- 多国框架，在这个框架下，世界分为六个区域：德国；

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欧元五国），这些国家近来的外部融资成本高；欧元区其他经济体；新兴亚洲；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

德国带给欧元区其他国家的溢出效应主要以两种方式传播：贸易渠道和实际汇率渠道。当德国政府增加开支导致国家经济产出增长时，贸易渠道发挥作用，这增加了德国从贸易合作伙伴进口的需求。当德国政府开支增加导致德国通货膨胀上升时，实际汇率渠道起作用。鉴于欧元区有统一的货币，如果成员国的通货膨胀高于其他成员国，则其实际汇率升值。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实际汇率升值，导致德国的进口需求扩大。

货币政策也影响溢出效应，可以抑制或增强贸易渠道和实际汇率渠道的效果。德国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率将促使欧洲中央银行（ECB）增加德国和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利率。这将抑制整个欧元区的国内需求，但是也会导致欧元升值，抑制欧元区出口。货币紧缩可能减少甚至打压贸易渠道和汇率渠道的作用，使欧元区实际 GDP 或剔除通货膨胀后的 GDP 疲软。但是如果换个说法，货币政策根据德国通货膨胀上升而调整，而利率保持不变，那么结果将是溢出效应相对变大。利率不变意味着通货膨胀上升，而且实际利率（剔除通货膨胀后）降低，这将刺激国内需求，导致欧元区实际汇率贬值——以及净出口增加。

增加政府开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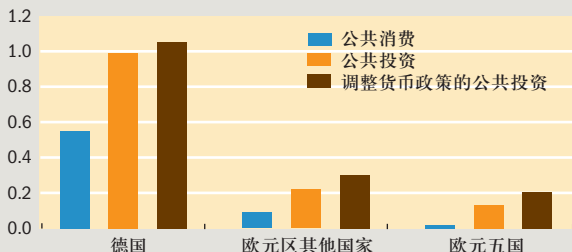
有多种财政刺激措施，如减税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或一般支出。不同类型刺激措施的溢出效应不同。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增加政府一般支出更为有利。

图2

投资王牌

在两年的时间里，德国公共投资对GDP增长的影响远远大于政府消费对GDP增长的影响，而且如果货币政策保持稳定，这个影响将更显著。

（基线偏离值，占实际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

注：比较基于为期两年、债务融资公共消费增长或投资增长形成的GDP增长2%的情形。基线代表不增加开支会发生的情况。蓝色柱图和橙色柱图分别代表如果货币政策制定者通过加息来应对开支增长，消费开支增长和投资开支增长引起的GDP增长。棕色柱图反映投资开支增长但不加息（货币政策调整）会发生的情况。欧元五国由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组成。

图2比较了一般商品和服务公共支出第二年的效应和基础设施投资效应。如果在增加政府赤字的资助下，两年间公共支出在GDP中的占比增长1%，则模型预测结果如下：

当政府增加一般商品和服务开支时，德国的实际GDP临时增长了0.5%。几乎没有给欧元五国带来溢出效应，但是其他欧元区国家（包括德国主要贸易伙伴，如比利时、法国和荷兰）的GDP略微增长了0.1%。扩大政府消费增加了总需求，产生产出正缺口（国家当前产出与能够高效产出之间的差额），提高国内和区域的通货膨胀率。利率随着货币政策紧缩而增加，以应对整个欧元区的高通胀压力。虽然欧元区提高利率的程度和时机不同，但是实际利率提高——由于德国相对于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国内通货膨胀更高——抬高了德国的实际汇率，这抵消了刺激措施对国内活动产生的积极效果，削弱了相关的溢出效应。因此，德国经常账户恶化，而

模型简介

IMF 广泛使用全球一体化货币财政模型（GIMF）作为分析财政（税收和支出）问题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的框架，如安德森等人（Anderson 等人，2013 年）所述。搭建 GIMF 旨在使研究人员能够分析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如何影响国内经济生产率。我们还利用这个模型来将基础设施项目获批和全面投入使用和支付之间的时间延迟考虑在内。

GIMF 多国结构让经济学家可以分析全球相互依赖关系和溢出效应。在这个模型中，世界由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欧元区其他国家；新兴亚洲；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组成。国际联系有两大来源。首先，对各个区域之间的贸易进行全面核算。其次，商品流动使模型可以确定经常账户，这只是全球储蓄和投资流动。每个区域都有：

- 两种家庭——没有储蓄、只能消费自己当前收入的“手头拮据”家庭以及可以储蓄和选择工作时间和消费水平的“优化”家庭。假设这些家庭平均规划周期为 20 年。家庭认为政府债务是财富；不考虑为后代存钱。
- 前瞻性企业——但是只规划了未来 20 年。
- 通过短期控制政策利率来追求价格稳定的货币政策——欧洲中央银行在整个欧元区实施货币政策。所有其他区域也通过独立的中央银行追求价格稳定。
- 长远来看，以一定水平的债务为目标的政府——尽管政府通过在 GDP 增长强劲时允许赤字下降，而在 GDP 增长疲软时允许赤字上升，试图在商业周期中稳定经济。

其欧元区贸易合作伙伴则略有改善。经常账户衡量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关系——出口减去进口加上净收入和净转移。

当前的低利率环境给德国提供了机会。

当政府进行公共投资时，情况就不同了。实际 GDP 有望实现持久增长。增加公共投资改善了国家基础设施，企业可以利用基础设施来降低成本，如交通运输成本，而且也可以改进国内外市场准入。因此，企业可以提高生产率，降低商品售价。这就增加了对企业商品的需求，进而意味着扩大劳动力和投资的国内需求，有助于实现实际 GDP 持续上升——GDP 最高增长 1%。也可以扩大溢出效应——给欧元五国带来的溢出效应约为 0.2%，而给欧元区其他国家的溢出效应约为 0.3%。因为德国基础设施存量长期发生变化，这些国内收益和溢出效应还会持续到第二年。

货币政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货币政策覆盖整个欧元区。通常情况下，货币政策抵消了与政府开支增加相关的通货膨胀压力，意味着利率提高可能会降低实际 GDP 和溢出效应的收益。然而，因为德国占欧元区经济总量的 1/4，ECB 可能只会提高德国中央银行计划加息幅度的 25%——如果存在德国中央银行的话。所以，溢出效应和国内效果高于每个欧元区成员国都有独立货币政策的效果。

如果 ECB 没有对两年的财政刺激带来的通胀压力做出反应，还可以获得更多收益。调整将考虑到实际

GDP 增长更为强劲 (1.1% 与 1.0%)，而且会给欧元区其他国家带来实际 GDP 上升 0.1% 的溢出效应。利率下调考虑到通货膨胀会上升，这进一步压低实际利率，从而加大对国内投资和消费的刺激。

这些结果假设基础设施项目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获得批准、完成施工并且投入运营。在更现实的实施延迟的情况下——项目第一年获得批准，但是支出一直持续三年，而基础设施到第四年才投入运营，最终，实际 GDP 的上升也会推迟 (见图 3)。由于竣工推迟 (以及相应的经济生产力提升推迟)，私人投资增长和就业增长也停滞不前。国内产出可能会暂时收缩，带来某些负面区域溢出效应。然而，加大公共投资的长期产出上升没有变化。实施延迟的一个副产品就是赤字开支延迟，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更平稳，这意味着短期内可以减少年度预算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可以加速实际 GDP 增长。ECB 可能继续实施足够的刺激措施，继续加息。但是，如果 ECB 不加息，整个欧元区的通货膨胀将会上升，导致实际利率为负，这将进一步增加整个欧元区的消费和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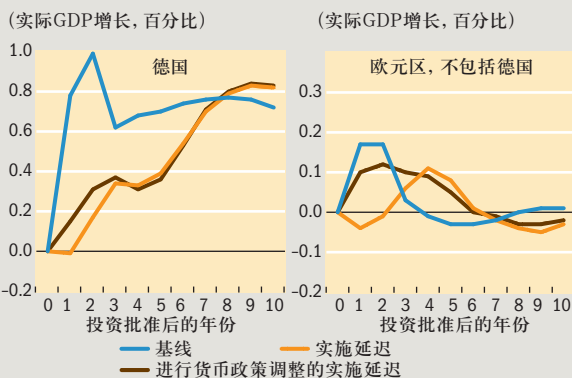
当前的低利率环境给德国提供了以历史有利率来为扩大投资提供资金支持的机会，这将给德国和整个欧洲带来良好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

塞利姆·埃莱克达 (Selim Elekdag) 是 IMF 货币与资本市场部副组长，德克·缪尔 (Dirk Muir) 是 IMF 研究部的经济学家。

图3

延迟影响

如果投资项目需要几年才竣工，一年期项目的实际GDP短期增长需要更长时间，但是长期收益不变。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

注：图中的曲线反映为期两年、债务融资公共投资增长一年形成的GDP增长1%的基准情况，以及货币政策调整（中央银行没有加息）和投资实施有三年延迟时所发生的变化。

参考文献：

Anderson, Derek, Benjamin Hunt, Mika Kortelainen, Michael Kumhof, Douglas Laxton, Dirk Muir, Susanna Mursula, and Stephen Snudden, 2013, "Getting to Know GIMF: The Simulation Properties of the Global Integrated Monetary and Fiscal Model," IMF Working Paper 13/55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Elekdag, Selim, and Dirk Muir, 2014, "Das Public Kapital: How Much Would Higher German Public Investment Help Germany and the Euro Area?" IMF Working Paper 14/227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eLibrary

用手指触摸全球经济和金融问题的脉搏

- 世界级的分析、预测和研究
- 洞悉区域性风险和机遇
- 超过15000个出版物，全文检索和注释
以及更多……

注册你自己的订阅号
现在只需99美元。
浏览eLibrary.imf.org/fd6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西班牙女孩凡妮莎·图多丽在曾经就读的巴塞罗那大学的操场上休息。

帮助求职者

年轻人失业会给家庭、社会和国家带来伤害

康铨承

当金融危机的阴影降临到凡妮莎·图多丽和妈妈的生活时，她只是个20岁的大学生，一直为她支付学费的母亲让她另寻其他经济来源。图多丽因此辍学，加入了队伍不断壮大的西班牙青年求职大军。

她说，“我们曾追求梦想，我们曾想要战胜全世界，我们曾认为我们会拥有一切，接着金融危机给了我们当头一棒”。

据欧洲委员会称，2013年中期，西班牙的青年失业率超过了56%，达历史最高水平。近期该国经济增长有所回升，但

青年失业问题仍长期存在，其负面影响会持续数十年——不只个人能感受到这种影响，社会也会受到影响。

西班牙的大规模青年失业可能具有其特殊性，但青年失业率高的现象在各地均有发现，包括资源丰富的中东地区密集的青年失业，撒哈拉以南非洲农村地区流动性低、技术水平较低的青年，深受金融危机影响的欧洲低端服务业岗位上大材小用、未充分就业的青年。

国际劳工组织(ILO)表示，2014年全球范围内共有7300万年龄在15—24岁

之间的青年求职人口——占此年龄组人口的14%，2007年的比例为12.4%。7000多万这个数字并不包括已放弃求职的怯志工作者等群体——也有部分评估显示真实数字高出此数字的三倍。

为何焦虑？

失业对每个人的自我认同感和精神面貌都具有破坏性，但是它对年轻人的影响更明显、更致命、更持久。

伦敦经济学院的约翰·沃兹沃思(John Wadsworth)指出，“对于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的年轻人，离开学校后直接走上工作岗位当然是最理想的。但青年失业的问题在于年轻人往往处于受雇和解雇的边缘地带”。当一家公司决定扩大员工队伍时，通常都会雇用年轻人，但是当公司要精简员工队伍时，先被解雇的通常也是年轻人。

目前处在经济萧条最艰苦的阶段，在低迷时期进入就业市场的年轻人遭受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持续数十年。针对20世纪80年代经济衰退期间经历长期失业的年轻人口的研究表明，即便今时今日，当年的年轻人已经四五十岁了，他们仍然很容易失业——其中找到工作的一部分人——其收入往往要比未经历过持续失业的同龄人低。

伦敦英国工会联盟的理查德·艾克塞尔(Richard Exell)指出，“这意味着到退休时，他们的养老金也相对较低。这将影响他们的终生”。

年轻人口的长期就业前景可能也十分暗淡，因为他们必须接受低于自身资历的工作。今年20岁的亨利·里维拉·安古洛来自厄瓜多尔，他成长过程中的大部分时期都是在西班牙度过——两年前完成高中教育后开始求职。安古洛去了巴塞罗那·阿克蒂瓦(Barcelona Activa，这是一家当地政府支持的机构，主要职责是为城市吸引更多的企业和就业机会)，希望对求职有所帮助。但是，他最后的结论是：“我发现不只我一个人是这种情况，那里很多比我资历高的人都在做服务员。”

首当其冲，遭遇重创

青年人口失业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其中一部分是各地区的共同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增长。在经济萎缩国家，年轻人总是首先受到冲击，而且这种冲击是最猛烈的：他们往往是最先被解雇的群体。失业后，他们

可能缺乏足够的经验、技能和网络去寻找其他工作。

在任何一个国家中，青年失业率通常都是一般性失业率的三倍。沃兹沃思(Wadsworth)认为，这两个统计数据往往步调一致——完全由经济增长决定。

“经济不增长，青年失业或一般性失业问题就无法得到改善。所有证据都表明，要想在降低失业率上取得进步，经济增长率必须超过2%。”沃兹沃思对英国就业形势如此评论道。

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保罗·塞拉卡特(Pau Serracant)指出，“西班牙并不存在青年失业问题，而是一般性失业问题”。他认为，实现经济增长是解决失业问题的首要步骤。

在经济萎缩国家，年轻人总是首先受到冲击。

低增长甚至经济萎缩可能是青年失业率高的最重要原因，但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扭转整体形势。以英国为例，该国青年失业人数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就出现上涨。目前失业人口虽已下降，但失业期正在不断延长。在大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青年求职者中1/3以上



亨利·里维拉·安古洛和女友伊丽莎白·迪·米格尔·罗德里格斯是西班牙数百万青年求职者中的一员。

人口的失业持续期超过6个月。

生活在伦敦的安·玛丽·泰勒是一位长期失业青年。安今年23岁，自16岁离开学校以来，一直在找工作，但始终没有成功，每周依靠约85美元的失业救济金生活，她不断与自己内心接受社会福利救助的耻辱斗争。“实在太郁闷了，你的斗志和动力完全都在走下坡路，尤其是当你依靠求职补贴过活的时候，会形成这样一个定势……每一天都必须找到从床上爬起来的勇气。”

没有学历的年轻人的就业前景最为渺茫，没有其他积累的经验和学历，泰勒现在要与比自己年纪更小的求职者竞争同一职位。她说，“如果我刚刚离开学校，我会认真地重新考虑每一件事，因为你必须坚决地做你想做的事。”

技能不匹配？

低增长若是造成青年失业率高的主要原因，那么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雇主和企业所需的技能和年轻人在教育系统中学习的技能之间的不匹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许多雇主抱怨找不到合格的人才填补职位空缺。

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国家就业政策委员会前主席

安东尼·卡内瓦莱 (Anthony Carnevale) 表示，“雇主们的抱怨基本属实：他们没有得到所需的技能，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他认为，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教育体制未能跟上当今社会的劳动力需求。

然而，另外一些专家（如 Exell）的争论点在于技能不匹配是否存在。他指出，现在的年轻人是最合格的人才——例如，英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他承认，毕业生人数的增长要求我们对高等教育抱有志在必得的一种买彩票的态度——现在是成功就业的必要和首要步骤。但艾克塞尔 (Exell) 不认为教育系统应该培养适用于批量生产作业的雇员。

他说，“在我们看来，现在有更多的雇主把自己当成教育和培训的消费者的态度，但却忘了自己也担负着教导员工的责任和职责，如果他们曾经有过这种认知的的话。”

艾克塞尔和卡内瓦莱的观点并不是最初提出时那般对立。国际劳工组织指出，“青年劳动力市场的技能不匹配已经呈现持久化、不断扩大的趋势。”过度教育和技能过高与教育不足和技能低下并存，与此同时，长期失业造成了越来越多的技能过时。”



来自厄瓜多尔的里维拉正在考虑与女友迪·米格尔一同回国。

劳动力市场的刚性

青年失业率高的第三个主要原因是劳动力市场的刚性(见“欧洲失业问题”,《金融与发展》2015年3月号),比如以劳动重税或高额最低工资为特点的高度管制劳动力市场。

以南非为例,该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青年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企业一贯将国家劳动法视为负担,并认为遵守法律代价高昂。麻省理工学院贫困实验室开展的一个研究项目表明,客观上讲,南非的劳动法规并不比其他相似收入水平国家的劳动法更繁琐,但是仅仅这种看法就阻碍了公司的新员工招聘,尤其是那些具有“较大风险”的人群——其中包括较年轻的或缺乏经验的工作者。

给年轻人带来巨大冲击的一种劳动力市场刚性是他们受雇于短期的、临时的或不稳定的工作。全球大多数青年人口都集中在发展中经济体——在缺乏稳定的高质量工作的情况下,这种刚性转化成了一种非固定的、非正规就业。

在欧洲,年轻工作者找到临时工作的可能性是成年工作者的三倍。在遭受金融危机打击的欧洲国家中,二者的差异更大。一般来讲,这些临时性工作合同的目的在于至少给求职者一个工作的机会。但是,反过来这类合同带来的非预期后果可能是将工作者限制在同样的短期临时工作中,工资低且几乎没有培训和职业发展的机会。

西班牙青年图多丽最终通过一家机构找到了工作——在巴塞罗那的一个世界级博物馆作兼职性的临时工,但轮班不规律且没有保障。虽然这份工作为她提供了实践语言技能和与来自全球各地的人接触的机会,但她和同龄人都渴望更加稳定的工作。

“在我们看来,现在有太多的雇主把自己当成教育和培训的消费者。”

“我是一个成年人,我需要一个成年人拥有的机会,而不是在公司需要你时遭受虐待,然后他们就会说‘先这样吧,我们不需要你了,你可以回家了,我们可能还会联系你。’”

在英国,这种临时工作或“零小时合同”已经成为一个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因为这种合同无法保证最低工作小时数,工作者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工作或是否需要工作。伦敦YMCA的李察·休斯(Richard Hughes)认为,“零小时合同”给年轻人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他举了一位名为克洛伊的年轻女性的例子。克洛伊决定放弃失业福利,选择零小时合同,做了一名临终关怀护士。这



安·玛丽·泰勒在英国伦敦一家咖啡馆翻看招聘启事。

份合同理论上规定每周工作0—35小时。由于工资不稳定,克洛伊无法支付房租,所以常常和朋友去做沙发客。

休斯说,“所以,基本上,她现在的情况就是找了一份让自己无家可归的工作。”

成年期推迟

在工作前景暗淡或毫无前景的情况下,年轻人自主创业、结婚和建立家庭的机会大大降低。由于没有财务自由,许多年轻人都搬回家中,依靠父母的资助生存。对于啃老族这一代人来说,他们的成人期已经被无限期地推迟了。这种趋势以往在福利制度薄弱的国家中更加普遍,但随着国家赤字的膨胀和福利支出的缩减,这种情况已经扩大到了青年失业人口一直依靠福利救济的国家中,塞拉肯特如是说。

“英国许多年轻人不得不比从前更依赖家庭。西班牙模式或南欧模式似乎已经在欧洲发展起来。”

此外,没有工作和长期失业的巨大压力和挫折也与预期寿命降低、老年期罹患心脏病的风险增加、自杀与罹患精神疾病的可能性增大有关。

有人将青年失业的规模和人力浪费视为一种社会紧急状态。年轻人口众多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年轻人口的膨胀开始变成是一种负债而非红利。税收收入损失、高额福利支出和生产率的降低加剧了人力浪费的成本。

同样令政府担忧的是,就业机会的缺乏可以转化为政府动荡并滋生犯罪和骚乱。2011年“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的部分原因就是受到中东和北非地区高青年失业



图多丽回到她在巴塞罗那求学时的故地。面对经济困难，这个西班牙年轻人不得不将学业推迟。



率的影响。

许多年轻人不再忍受渺茫的前景，选择了离开，去遥远的国度寻求更好的生活——这种先例自古以来屡见不鲜。联合国的估计结果显示，移民人口中有 1/8 是年龄在 15—24 岁之间的年轻人。

自全球经济走低以来，受到金融危机重创的欧元区国家的年轻人已陆续流向欧洲其他国家，使这些国家损失了重要的技能，一些最具头脑、最有资格和最有积极性的年轻人也因此离开。在无国界的欧洲，很难对其具体数据进行统计，因为欧洲年轻人的大部分迁移都没有被正式记录下来。

在大批年轻西班牙人走出国门的同时，也有成百上千的移民回到自己的祖国，扭转了西班牙长达十年之久的人口膨胀局面。13 年前，里维拉和他的家人从家乡厄瓜多尔移居西班牙，当时的西班牙就像希望的灯塔，吸引着拉丁美洲人的到来。现在，里维拉考虑回到南美，这次他将带着西班牙女友伊丽莎白·迪·米格尔·罗德里格斯一起回去，寻找工作。

米格尔说，“如果找不到工作，我会去其他地方试试

“如果我刚刚离开学校，我会认真地重新考虑每一件事，”泰勒说。

看，在这我也做不了什么。”

里维拉补充说，“我很悲观。考虑到目前的状况，要改变现状，除非突然发生什么大事，我真怀疑我们是否还能回到以前的快乐时光。”■

康铨承 (Hyun-Sung Khang) 是《金融与发展》的高级编辑。

“阿拉伯之春” 后的这四年

阿德南·马扎雷、托克希尔·米兹奥维

四年前，数百万阿拉伯民众走上街头示威抗议，强烈要求政治、社会和经济正义。整个世界为之震惊。“阿拉伯之春”揭露了多年来掩藏在经济和政治稳定之下的严重经济疲软。从表面上看，虽然贫困和不平等指标已有所改善，结构改革也取得了进展，但在这种表象之下，高失业率、恶劣的生活条件和经济机会的缺乏激起了阿拉伯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愤怒和不满。

“阿拉伯之春”运动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国际社会使用此术语指代埃及、约旦、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和也门）的经济框架与制度需要做出改变。运动爆发后，这些国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其经济框架中的核心结构性缺陷并未得到解决。该地区虽处于各种冲

突分歧的控制之下，但从现在开始逐步完成今后的任务才是重点。

隔离与分裂

长期以来，中东和北非(MENA)地区，包括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的主要薄弱点在于因高贸易壁垒和垄断市场造成的与全球经济的相对隔离和区域化分裂。在非燃料出口领域，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出口商品在全球市场份额中所占比例不足1%——远远低于东亚的10%和拉丁美洲的4%——而且这些输出商品中有近1/10最终一定会滞留在该地区(Malik和Awadallah, 2013年)。在全球化的时代，这种隔绝会造成经济现代化进程缓慢，技术转移受限，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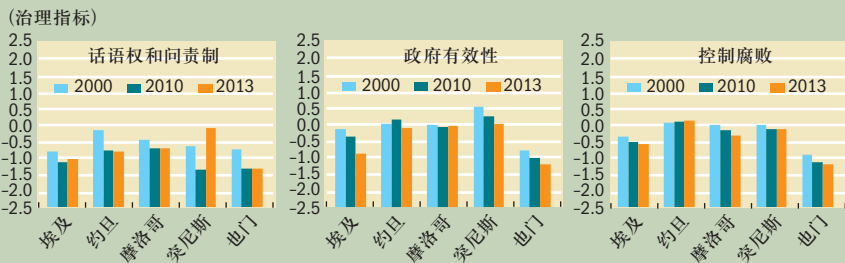
尽管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仍须对其经济中的一些根本缺陷进行纠正



突尼斯杜兹，在批发市场上贩卖海枣的男人。

图1
缓慢进步

自“阿拉伯之春”以来，大部分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在治理指标方面未见明显改进。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
注：治理得分范围约为-2.5至2.5，治理越好则此值越高。

最终导致竞争力和生产率水平低下。

尽管经济自由化有所提高，但是来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举足轻重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残余影响仍然以多种形式持续发挥作用。效率低下的大型公共企业和臃肿的行政部门扼杀了民营企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虽然拥有庞大的公共部门，却无法为国民提供充分的服务。依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多维贫困”指标，这些国家中没有机会享受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基础服务（如卫生设备、清洁水和电力）的人口远远超过总人口的1/3——落后于全球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之下，发展中亚洲和拉丁美洲缺乏这些基础服务的人口比例分别为26%和8%（IMF，2014a）。

“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前，该地区的社会保障缺乏。与大部分MENA地区一样，在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一般性物价补贴成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社会契约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些补贴未能始终用于最需要的地方：例如，2008年，埃及最贫困的40%人口仅得到3%的汽油补贴（Sdravovich等人，2014年）。其他许多国家投入到补贴中的公共资源的份额已达到全球最高水平，避免了将其用于额外的生产性使用（如投资青年教育和职业培训），却置贫困人口艰难生活于不顾的现象。

各国必须制定改革的愿景和路径。

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的治理工作普遍软弱无力，在“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前的十年中，大多数国家的治理工作严重恶化（见图1）。加之之前文提到的其他因素，薄弱的制度框架为腐败提供了方便之门，形成了私营部门遏制竞争、阻碍就业创造的经济环境。这些弊端剥夺了数百万青年及优秀人才的经济与就业机会。

因此，这些国家的失业率始终保持着全球最高水平，

尤其是女性和青年人口的失业率，在这一群体中，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失业。同样，这些国家的信贷获取也处于全球最低水平。以2010年为例，该地区能够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人口比例不足4%。比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还低，其水平仅相当于撒哈拉以南非洲。

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前的若干年里，宏观经济指标和家庭层面的幸福感之间的断裂不断扩大。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2005—2010年埃及人均GDP增长了34%，而感到“幸福”的人口数量却急剧下

降，从近1/3下降到12%（Clifton和Morales，2011年）。2008—2010年，突尼斯有数据显示感到“幸福”的人口数量下降了10个百分点，降至令人沮丧的14%。

新愿景

自“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以来，这些经济体的表现如何？是否为经济制度和政策提出了新的发展愿景？

运动爆发时，全球经济尚未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在这种十分不利的外部环境下，国内经济混乱、社会关系紧张及近年来该地区不断蔓延的对立冲突共同抑制了该地区的经济表现，拉低了贸易和投资，使其更加不堪一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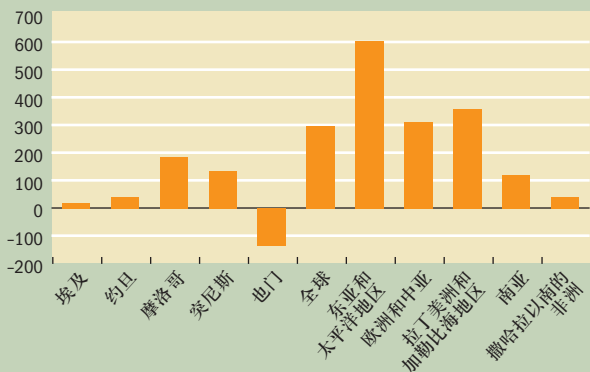
虽然起步并不顺利，但这些国家仍然保持了宏观经济的稳定，避免了给最脆弱的国民带来伤害的经济危机。首先，耗尽外汇储备缓冲并通过扩大赤字累积国债，埃及和约旦尤为明显。此后，随着国内政治的愈加稳定和外部援助力度的加大，大部分国家已经逐步重建了外汇储备缓冲，并开始削减预算赤字。这些早期成绩有助于这些国家保持积极的经济增长。但是，近期利比亚和也门的冲突事件破坏了这种进步，使这些国家倒退了许多年。

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已经在结构改革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虽然这种进展并不平衡。埃及、约旦、摩洛哥和也门的能源补贴显著降低，使得财政资源能够用于更有针对性的社会保障和促进增长的公共投资。各国政府已经采取措施改进商业环境的各个方面，如竞争力、破产与投资法规；加强税收政策和管理；实施财政部门改革。刺激就业机会的创造、减少劳动力市场中技能不匹配现象的计划正在制定当中——目前已经使营商环境指标有了一些改进。

这些措施的方向是正确的，但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些转型期经济体的结构缺陷还需要付出更多。具体而言，

图2
增长缓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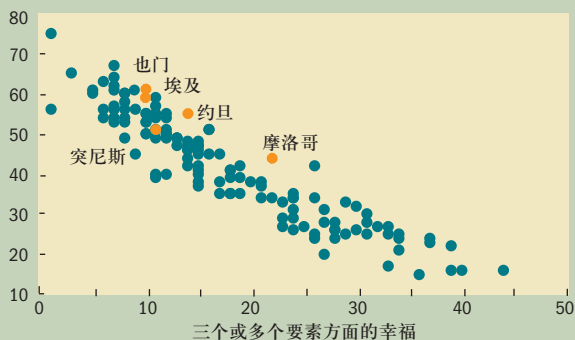
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
(人均GDP的变化, 2005年定值美元, 2010—2013年)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世界发展指标》。

图3
发展停滞

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在公民整体幸福感方面落后于许多国家。
(在任何要素中均无幸福感, 受访对象百分比)



资料来源: Gallup-Healthways (2014年)。

注: 此调查于2013年实施, 确定了幸福感的五个要素: 目标(动机)、社交(人际关系)、财务(资源)、团体(感觉安全和被认可)和身体(健康)。

对公共部门的依赖性仍然很高, 私营部门仍然不愿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管理方法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有针对性的社会保障网络尚未到位, 仍无法提供充足的基本服务。因此, 家庭层面的经济收入仍未得到改善, 自2011年起, 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出现了恶化。

- 受到经济增长不充分的刺激, 大部分国家失业率上升。最棘手的仍然是青年失业问题(从摩洛哥的20%到突尼斯的37%)和女性失业问题。劳动力参与率与就业人口比进一步下降, 说明求职者的挫败感进一步扩大。

- 埃及和约旦(不包括叙利亚难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仍处于停滞状态, 但突尼斯和摩洛哥的人均收入有所上涨。从整体上看, 转型期的阿拉伯国家的收入增长落后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见图2)。

- 个体幸福感仍然低下。最新的盖洛普健康福利调

查显示, 在对幸福元素“目标”, 即公民实现目标的动力进行的测量中, 这些国家(除摩洛哥外)中认为自己很“幸福”(thriving)的受访对象的百分比最低, 有力地说明了公民的经济机会受到限制的事实(Gallup-Healthways, 2014年)。在不同幸福维度中, 感到幸福的受访对象的百分比同样很低。最重要的是, 埃及、约旦和突尼斯的大部分受访对象表示他们在任何维度上都没有幸福感(见图3)。

这些结果说明挑战将持续存在(如未扩大)。这些痛苦将有可能继续激化社会不满并显著削弱公共部门的改革力度和私营部门对这些改革做出的响应。

艰难的道路

远离2011年之前的遗留影响对于转型期阿拉伯国家的成功至关重要。这些国家必须加速并深化结构性改革, 以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性, 实现可持续的、包容性的高度增长。不能忽视造成这些国家一般宏观经济指标和生活条件间鸿沟的结构缺陷。对所有国家来说, 具体任务涉及积极的治理改革, 建立一个能动的、有利的商业环境, 从国家主导投资向私人投资转变, 增加融资渠道、实施劳动力市场和教育改革以刺激就业, 形成有效的社会保障网络, 用以保护弱势群体, 降低贸易壁垒, 顺利地融入世界经济当中去(IMF, 2014b)。

各国必须制定改革的愿景和路径。与“阿拉伯之春”爆发前相比, 这项任务的执行将会更加艰难。虽然国际石油价格下降缓解了部分压力, 但各政府财政资源有限, 地区冲突和投资欲望淡薄又给外部环境蒙上了阴影。克服过去的改革阻力需要政治意愿和决心以及来自国际社会的支持。■

阿德南·马扎雷(Adnan Mazarei)是IMF中东和中亚部副主任; 托克希尔·米兹奥维(Tokhir Mirzoev)是该部门的高级经济学家。

参考文献:

Clifton, Jon, and Lymari Morales, 2011, “Egyptians’, Tunisians’ Wellbeing Plummets Despite GDP Gains,” Gallup Daily, February 2.
Gallup-Healthways, 2014, “State of Global Well-Being: Results of the Gallup-Healthways Global Well-Being Index” (Franklin, Tennesse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14a,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Annex IV* (Washington, October).
——, 2014b, *Toward New Horizons: Arab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mid Political Transitions* (Washington).
Malik, Adeel, and Bassem Awadallah, 2013, “The Economics of the Arab Spring,” *World Development*, Vol. 45 (May), pp. 296–313.
Sdravovich, Carlo, Randa Sab, Younes Zouhar, and Giorgia Albertin, 2014, *Subsidy Reform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最新出版物

《前沿和发展中亚洲： 下一代新兴市场》

Alfred Schipke 编

25美元, © 2015年, 272页, 平装。

《拉丁美洲： 在全球大变革的环境下 维持增长和稳定》

Dora Iakova、Luis M. Cubeddu、Gustavo Adler和
Sebastian Sosa 编

25美元, © 2014年, 270页, 平装。

《金融危机： 原因、后果及政策响应》

Stijn Claessens、M. Ayhan Kose、Luc Laeven和
Fabián Valencia 编

40美元, © 2014年, 670页, 精装。

《安倍经济学能成功吗？ 克服日本失去的10年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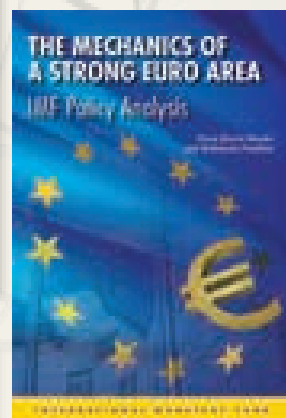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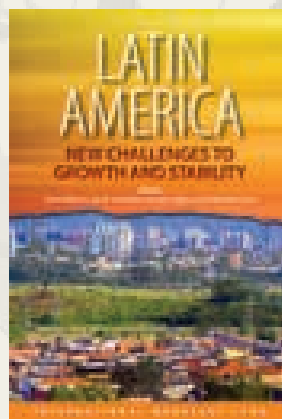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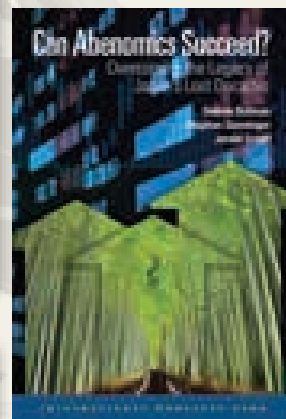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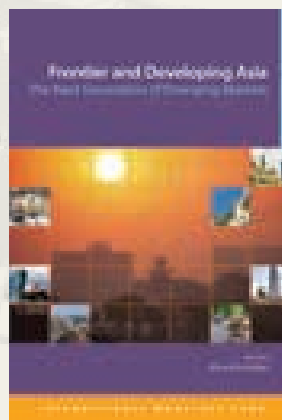
Dennis Botman、Stephan Danninger和Jerald Schiff著

25美元, © 2015年, 201页, 平装。

《牢固欧元区的结构： IMF政策分析》

Mahmood Pradhan和Petya Koeva Brooks 著

40美元, © 2015年, 约250页, 平装。



Imfbookstore.org/fd65

Finance & Development, June 2015



MFICA2015002